

# 目 录

## 专题研究

被遗忘的革命家伍澄宇与日中战争——日本占领地的未来设想	关 智英	..... 1
文革后期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胎动	八塚 正晃	..... 15
中国共产党与宗教团体 ——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基督教爱国团体改革的讨论为中心	上野 正弥	.....32
中国国内具有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的是哪些人群 ——基于 2012 年反日示威游行前爆发的居民认识调查	陈 嵩	..... 49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探索政策变化的原因	吉川纯惠	..... 68

## 书评·书介

评 御手洗大辅著《中国的权利论：关于现代中国法的理论构造研究》 ——现代中国法保障“合法权利”——	松井 直之	..... 86
评 郑成著《国共内战期的中共苏联关系——以旅顺大连地区为中心》	石井 明	..... 89
评 小林善文著《中国环境政策（南水北调）——能否解决水危机？》	上田 信	..... 93
评 北川秀树 洼田顺平编著《流域治理和中国的环境政策 ——将日中两国经验和智慧用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利用》	小长谷 有纪	..... 97
评 藤谷浩悦著《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	阿南 友亮	..... 100
评 佐藤仁史著《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	吉泽诚 一郎	..... 109

# 被遗忘的革命家伍澄宇与日中战争——日本占领地的未来设想

关 智英

(东京大学)

## 一、引言

本文旨在阐明伍澄宇自清末与孙中山并肩参加革命，至日中战争时期参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下略称维新政府）、汪精卫国民政府（以下略称汪政权）的活动及主张，籍此重新探讨日本占领下的两政权。

有关日中战争时期傀儡政权的研究，学界已有丰硕的成果。除了主要考察与日本关系的既往研究外，近年来关于合作的实际状况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这些研究明确指出，维新政府、汪政权结果都成为了傀儡政权。<sup>1</sup>笔者也无意否定这一看法。

但笔者认为，从“统治—被统治”、“占领—被占领”的视角并不能覆盖占领地政权具有的多样性。尽管是以日本占领为前提，但实际上参加占领地政府的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设想，根据各自的经历、立场不同有着多样的主张。<sup>2</sup>而既往研究中，关于对参加傀儡政府的人们对自身所处的政权有何认识，又是如何在日本占领的前提下思考中国将来的可说是极少关注。本文并非为傀儡政权翻案，而是通过分析参加傀儡政权人物的政论，来达到多层面理解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这一目的。因此，可供考察的一个有力线索即是伍澄宇的事例。

伍澄宇可谓是被遗忘的革命家。他的部分活动可从收录在《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集外集》、《黄兴集》的信函、冯自由的著作中窥知，<sup>3</sup>但在迄今的中国史研究中除了提及他曾

---

<sup>1</sup>在此仅列举近年的研究即有[日]柴田哲雄：『協力・抵抗・沈黙—汪精衛南京政府のイデオロギーに対する比較史的アプローチ』，成文堂2009年，[日]堀井弘一郎：『汪兆銘政権と新国民運動』，創文社，2011年，[日]小笠原強：『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汪精衛政権の政策展開と実態』，専修大学出版社，2014年，余子道等：《汪伪政权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sup>2</sup>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可参阅拙文：「袁殊と興亜建国運動—汪精衛政権成立前後の対日和平陣営の動き」，『東洋学報』94卷1号，2012年，「興亜建国運動とその主張—日中戦争期中国における和平論」『中国研究月報』66卷7号，2012年，「日中戦争時期中国占領地における将来構想—中華民国維新政府指導層の時局観」，『史学雑誌』122卷1号，2013年。

<sup>3</sup>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孙中山全集》卷3，中华书局，1984年，第106页，第170页，第225页。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366页、第370-372页、第461页。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70-71页、第165-166页。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70页，同《华侨革命组织史话》，正中书局，1954年，第61-66页。

首倡将航空部队引进中国之外，其他的都知之甚少。<sup>4</sup>唯一例外的是苏珊·马什(Susan H. Marsh)曾提及伍澄宇《维新政纲原论》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维新政府的意识形态，但其只是着眼于伍的政论，未对伍的人物本身、他是如何加入维新政府与汪政权的，此举有何意义等并未作进一步的深究。<sup>5</sup>

伍澄宇被遗忘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因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在北美和东南亚，在中国国内的知名度有限，伍澄宇所藏的资料毁于战火之中，其在战后又被控为“汉奸”等。但伍澄宇自同盟会伊始即参加革命，孙中山也十分信任他，曾拟将长女孙姪许配给伍。同时期伍澄宇倡导的民德主义，成为大民会（隶属维新政府的民众组织）的理由支柱；伍澄宇在维新政府、汪政权时任教县政训练所，提倡积极实施宪政，以及在战后台湾坚持著书立论，鉴于其生涯中的活动及言论均有某种一贯性，探析伍澄宇的人生轨迹与政论，不仅有助于了解日中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地的动向，对理解近现代中国也不无裨益。

有关伍澄宇的史料包括以下数种。1920年连载于《新广东报》的《革命言行录》详细记录了伍澄宇的活动。由于是伍澄宇自身的回忆，不可否认可能对其的活动有所夸大，但因发表于孙中山等众多相关人士还健在的时期，可视为有一定的可信度。该连载之后汇集为《伍平一先生革命言行录》（阳明学会，1941年），本文引用的即为这一版本（以下自该书的引用仅标明页数）。

伍澄宇在美国参与发行的《少年中国晨报》，因所在不明笔者未能确认，但介绍该报与孙中山关系的书中刊载了多篇伍澄宇的文章（一部分为影印），极为有用。<sup>6</sup>而有关伍澄宇1910年代的政论，在日本出版的《国体精理》<sup>7</sup>较为详细。

伍澄宇一生著作颇丰，从中不难得知其政治志向。以下将在梳理伍澄宇自辛亥革命前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活动的基础上，分析维新政府、汪政权对其的意义。

## 二、在美国的活动

### 1. 设立中国同盟会美洲支部

伍澄宇（号平一）1888年生于广东省台山县，比同为广东人的汪精卫小5岁，比蒋

---

<sup>4</sup>刘师古：《中国最早的飞机队一段史实》，《传记文学》30卷4期，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李祯祥：《K党元老伍澄宇 改朝功臣变祭品》（《新台湾》621期，2008年2月）中介绍了伍澄宇的履历，惜未够详细。

<sup>5</sup>Susan H. Marsh, "Chou Fo-hai: The Making of a Collaborator",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日译本为[日]入江昭编著、岡本幸治监译：『中国人と日本人—交流・友好・反発の近代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12年。

<sup>6</sup>方李邦琴主编：《孙中山与少年中国—从美国当年的报纸看辛亥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sup>7</sup>伍澄宇著、谭公甫编：《国体精理》，南洋民治社，1915年。

介石小1岁。伍澄宇曾东渡日本（具体时间待考），在日本大学法科<sup>8</sup>学习时加入中国同盟会。之后伍澄宇赴美，当时同盟会计划派遣专职的该会成员创建美洲支部，<sup>9</sup>伍的赴美应与此有关。

1910年1月，隐瞒革命党人身份在费城华侨学校活动的伍澄宇接到了孙中山自欧洲的来信，告知其将前往美国。信中表示因前年云南河口起义失败，且来自东南亚华侨的援助日渐匮乏，此行是为了在美国设立中国同盟会支部，进一步筹集革命资金。

孙中山曾先后于1896年、1904年两次赴美，试图获得在美华侨的支持，但并未取得显著成果。但在此次第三度访美时，终于成功创建中国同盟会美洲支部，获得了当地华侨的资金援助。<sup>10</sup>从中起到穿针引线作用同盟会员之一便是伍澄宇。

抵达美国后，与伍澄宇会合后的孙中山提议，利用筹自在美华侨的2-3万美元，再加上东南亚华侨捐助的约100万元，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对此，伍澄宇指出，同盟会在美国尚无支部，同志也为数不多，如需借助在美华侨的献金，应改变起义的时期。据称在座的同志李是男也赞成伍的意见。最后广州起义在当时以失败告终（第1页）。

1910年2月24日，中国同盟会美洲支部成立。<sup>11</sup>当时，按照孙中山的意向，伍澄宇负责修改宣誓书（第2页）。而此前作为同盟会方针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被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这一改动出自伍澄宇的主张，即“驱除的意义不如废灭彻底，平均地权也不过是体现了民生主义的一方面”（第8页）。

据伍澄宇称，当时在美国的华侨多冀望中国进行内政改革，几乎都支持保皇派，争取这些华侨支持革命党人是伍的重要任务。伍澄宇回忆，“维新派士醉心中国的维新事业，均怀有救国之志。惟以彼等听命于康有为、梁启超为憾。故吾决定仅攻击康梁而非保皇派，而多数在美华侨终悟革命，加入我方”。3月6日，费城也设立了同盟会分部，由伍澄宇任临时会长（第3页）。

## 2. 《少年中国晨报》的发行

伍澄宇还参与了同盟会美洲支部机关报的创刊。机关报延续当时在旧金山发行的《美洲少年周报》，按照伍的提议以《少年中国晨报》之名于1910年8月20日创刊。伍澄宇除在创刊号撰文《本报发刊言论前途》外（第7页），之后也在《中国共和政体原论》<sup>12</sup>的文章中，主张革命、共和（参见下表）。此时正值武昌起义爆发之际。

---

<sup>8</sup>《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笔录》（1946年5月3日），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099页。但《国防部台湾军人监狱叛乱犯调查表》中，称“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而《国防部台湾军人监狱考核表》中记载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吴坤煌等叛乱案》0039-1571-26434596，国家档案管理局。

<sup>9</sup>冯自由：前引《华侨革命开国史》，第61页。

<sup>10</sup>邵雍：《同盟会时期孙中山与美国致公堂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卷3期，2006年7月。

<sup>11</sup>冯自由称成立日期为2月27日（前引《华侨革命组织史话》，第64页），但因冯当时不在现场，伍澄宇的回忆应更为可信。

<sup>12</sup>伍澄宇：前引《国体精理》，第124页。

表 《少年中国晨报》中伍澄宇署名文章<sup>13</sup>

日期	文章标题	概要
1911. 7. 7	世界报伪电伪新闻之铁案	批判保皇派报纸。
1911. 7. 8	世界报伪电伪新闻之铁案 (续昨)	同上。
1911. 7. 25	中国大举革命之先声	报道广州起义后的动向。
1911. 8. 6	今日追悼广州革命军之殉义一 关于岭南革命论之一	追悼广州革命军阵亡者。
1911. 8. 8	观追悼广州革命殉义诸公盛会 感言一关于岭南革命论之二	报道广州革命军阵亡者追悼会的盛况。
1911. 8. 23	驳梁启超书	批判梁启超著《清国立宪之前途》。
1911. 9. 4	普告洪门为筹饷劝捐事	呼吁为洪门劝捐。
1912. 1. 3	政治革命之先决问题(续)	说明中国革命为五族共和。
1912. 1. 7	对于今日游街祝典之希望	祝贺孙中山就任总统。
1912. 1. 8	政治革命之先决问题(再续)	指出资政院为傀儡,清政府不具备立宪君主的基础。
1912. 1. 10	革命军与国际法之关系	由伍澄宇翻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国际法教授高桥作卫的著作。
1912. 1. 11	政治革命之先决问题(三续)一 研究民主君主两问题者注意	引用『滿州日日新聞』的报道,指出日本人与中国人国体不同。
1912. 1. 17	政治革命之先决问题(四续)一 研究民主君主两问题者注意	指出中国追求的并非清朝的君主,而是人民的民主。
1912. 1. 18	快哉袁贼之遇炸一宣布袁世凯之罪状	乐见对袁世凯的暗杀未遂。
1912. 1. 19	政治革命之先决问题(五续)一 研究民主君主两问题者注意	以外国的历史为例,阐述清朝的残暴性。
1912. 1. 20	政治革命之先决问题(六续)一 研究民主君主两问题者注意	主张不能实行清政府的立宪君主制。
1912. 1. 22	袁贼帝王思想大暴露 告纷纷袁贼被杀之诸君 维新妖报其奈各省之民意何 天降大任也(以上时评四种)	批判轻视民党的袁世凯。 主张应尽快实行北伐。 批判保皇派的《维新报》。 报道受饥馑之苦的民众已达

<sup>13</sup>参考方李邦琴前引书,由笔者统计。

数百万。

1912. 1. 23      政治革命之先决问题（六续）——      批判信奉英国立宪君主制的  
研究民主君主两问题者注意      保皇派

1911年10月10日，伍澄宇接到汉口的电报获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迅速通知孙中山。当时在丹佛的孙中山与伍澄宇决定，与1910年黄花岗起义时一样，向国外拍发电报声阐明革命的意义，寻求赞助，并由伍澄宇起草电文，同盟会会员唐琼昌将其译成英文。此外，还决定以中华革命军大总统的名义致电国内各地的党员以及清政府的督抚。

原先孙中山因自身与清政府的督抚无直接联系，面向国内的布告只预想以党员为对象。但伍澄宇认为，“革命之大义，人皆有相同之情。即便素不相识，如遥自远方致电，当无人不动心，此必引起革命”，最终电报也发给了中国各地的督抚（第17页）。

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当地的报纸都刊载了孙中山与在美同盟会员的照片，寄往伍澄宇处表示愿意参加革命或提供资金援助的外国人来信源源不断。而当时革命党在美国宣传的旗帜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因无处贩卖，伍澄宇与赶自加拿大的冯自由等在筹饷局内成立国旗公司制作旗帜，在美国各处销售（第19页）。

### 三、辛亥革命后的活动

#### 1. 从美国到东南亚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指示伍澄宇在国内从事革命运动。对此，伍澄宇认为南军在进驻北京之前革命难言成功，应继续在美国招募会员、筹集资金，从而依然留美开展活动（20页）。

此时伍澄宇还主张引进刚刚实用化的飞机。他提议如由中国22省各自负担资金，每年引进20架飞机，5年内即可引进2200架飞机，并与飞行师谭根等表演飞行，进行宣传活动（第27页）。

1913年伍澄宇离开美国踏上回国的归途，但因二次革命失败其无法返回中国，而于1914年3月在东京与孙中山进行了会面，并向孙提出了以下三点。第一、由于很难在中国国内组织政府，应在东京恢复同盟会总部继续革命事业。第二、今后的革命运动应重视北方，考虑与满洲的马贼及甘肃的白莲教合作。第三、训练以飞机发动攻击。

当初伍澄宇预定在日本进行飞行训练，但因故无法实现后，遂前往菲律宾的马尼拉（任中华革命党菲律宾联络员<sup>14</sup>），之后在东南亚渡过四年，致力于向华侨募集资金及引进飞机（第36-37页）。

在此期间，伍澄宇仍然继续言论活动。1915年在新加坡时，伍澄宇写成《驳梁启超之国体论》，对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中华杂志》1卷8期，1915年）的主张——政体与国体应分开讨论。政论家、政治家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谋政体政象之改进即可，不应过问国体，人为的选择国体——进行了驳斥。伍澄宇批判称，“政论家、政治家既以国

<sup>14</sup>张磊：《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4页。

家为活动场所，不可不问国体之变更，而梁启超将中华民国混乱之原因归于革命而非袁世凯乃是谬误”。<sup>15</sup>

## 2. 与孙中山的关系

伍澄宇与孙中山处于怎样的关系呢。就革命成功后的建都问题，伍澄宇在费城与孙中山讨论时表示，“若以中国本部而论，金陵为中心，若合蒙古、满洲各藩属而论，则北京为中心。吾恐迁都金陵，北境或将空虚。但为去除官僚政治，必须迁都一新天下。故如迁都金陵，须在北境设边防军，巩固国防”（第3页）。

关于革命资金的筹措，伍澄宇也曾大胆建议向在美的犹太人借款，或是可将外蒙古租借给志在建国的犹太人（第8页）。当被问到《光华报》上雷铁崖与戴天仇的议论相比较如何时，伍澄宇答曰“若以文章而论，铁崖议论之根底较深，若以革命之眼光议论，则天仇更胜一筹”（第12页）。据称孙中山对此也表赞同。

但两人意见并非总保持一致。中华民国刚成立时伍澄宇寄给孙中山的信函中，批评称政府的成立宣言中未提到军政、训政、宪政的三序方略。<sup>16</sup>孙中山将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黄兴辞去陆军部总长时<sup>17</sup>，伍也坦率地指出此为失策之举（第24页）。

## 3. 提倡四民主义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伍澄宇就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进行了讨论。当时孙中山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已在辛亥革命中达成。但伍澄宇不认同这一想法。伍澄宇称“君主之统治以威为主，民主之统治以德为主，但目前还未进入德之阶段”，因此应在三民主义再加上“民德主义”，成为“四民主义”<sup>18</sup>（第32页）。这一“民德主义”的讨论也与日中战争时期大民会提倡的口号联系在一起（后述）。

1914年中华革命党创立时，在该党的方针中删去了民族主义，伍澄宇以“当前国内各民族未获自由，国外也未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由，对此举表示了质疑（第42页）。

由此可知，尽管伍澄宇听从孙中山的授意行动，但也积极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虽然孙中山咨询的同志不止伍澄宇一人，但可以看出孙中山就各种问题与伍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孙中山也十分器重伍澄宇，尽管伍曾放言“革命成功之前决不成家”，但孙中山将长女孙姪介绍

<sup>15</sup>伍澄宇：前引《国体精理》，第86-100页。

<sup>16</sup>《伍平一致孙中山书》（1912年1月15日），前引《黄兴集》，第166页。

<sup>17</sup>黄兴在1912年4月20日的书信中叙述了辞职理由。前引《黄兴集》，第165-166页。

<sup>18</sup>除伍澄宇之外，也有其他人提倡四民主义的例子。1927年6月14日，张作霖等北方将领在会议中表示，“安国军主张除三民主义外，再加上民德主义，以巩固国家之本”。《奉天重要会议 诸将领结拜誓同心》，《晨报》1927年6月16日，第2版。同时期张作霖还称，“之前虽未积极赞成三民主义，但亦未消极反对。以三民主义为国家建设之基础原本并非不可能，中国乃礼仪之邦，重视道德，因此加上民德，以四民即可妥协”。《四民主义》，《大公报》1927年6月25日，第2版。当时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合并流成为一大问题，而争论的焦点正是北京政府是否愿意承认三民主义，进行易帜。《社评 改名易帜问题》，《大公报》1927年6月15日，第1版。

给伍，并在她赴美留学时托伍澄宇代为照顾（第 26-27 页）。不幸的是孙姃在美患病，回国后不久即去世。伍澄宇也作诗表达了哀悼之情。<sup>19</sup>

#### 四、归国后的活动

##### 1. 对国内政治的不满

1917 年，伍澄宇约时隔十年后返回中国。之后除参与上海的《民国日报》外，还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会长、大元帅府侍从秘书、大理院推事、建国军总参议、广东建设委员会委员等，并在广州岭南公学执教。<sup>20</sup>但孙中山去世后伍澄宇回到广东，<sup>21</sup>逐渐与政界保持距离，甚至未更新国民党员的登记。<sup>22</sup>

伍澄宇离开政界的具体原因不明，但似乎与其阔别十年后重返中国政界的观感不佳有关。其对领导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也表示了不满（具体后述）。此时执笔的《华侨与民国》之中，呼吁应让中国国内的人们更多的了解华侨在中华民国成立中起到的作用。<sup>23</sup>这是出于国内对华侨在革命运动中的援助，甚至是对伍澄宇自身的活动未有充分了解的不满。

1925 年，伍澄宇在香港向黄仲贤所言也可窥知其当时的心境。“国家上无道之标准，下无守法之人。无需赘言，任何主义都以掩饰表面者居多，罕有努力实行者。根本之改造在于革心，革心之基础，在驰思知行合一，为救国之大本”。之后，伍澄宇与黄仲贤等成立了阳明学会。虽然仍不清楚阳明学会的具体活动，但应是伍澄宇与学生每周组织的学习会，其讲授的内容后被整理成《讲习录》、《阳明哲理》。<sup>24</sup>

##### 2. 投身律师行业

1925 年，伍澄宇在上海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正如伍本人所称事业颇为成功，<sup>25</sup>自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其上海《民国日报》频繁刊登广告，可知接手的案子当不在少数。<sup>26</sup>同

<sup>19</sup>张磊：前引《孙中山辞典》，第 294 页。伍平一：《送孙姃女士东归》，《去国十年诗存》，敬业出版社，1958 年，第 9-10 页，其中介绍了孙中山寄去照片介绍孙姃是在辛亥革命前。

<sup>20</sup>《门人黄仲贤序》，前引《伍平一先生革命言行录》。《伍澄宇病逝》，《中央日报》1962 年 11 月 13 日，第 3 版。China Weekly Review ed., *Who's Who in China: Containing the Pictures and Biographies of China's Best Known Political, Financial,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Men(4th ed.)*, Shanghai, China Weekly Review, 1931, pp.437-438.

<sup>21</sup>伍平一：《辩言》，前引《去国十年诗存》，第 1 页。

<sup>22</sup>前引《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笔录》（1946 年 5 月 3 日），《审判汪伪汉奸笔录》，第 1099 页。

<sup>23</sup>伍平一：《华侨与民国》，《新国民杂志》第 3 期，1917 年。在伍平一发表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报告》（《中央导报》1 卷 12 期，1940 年）中，也同样提及了汪精卫在革命中的活跃。

<sup>24</sup>前引《门人黄仲贤序》，《伍平一先生革命言行录》。

<sup>25</sup>《伍澄宇辩诉状》（1946 年 5 月 4 日），前引《审判汪伪汉奸笔录》，第 1102 页。

<sup>26</sup>参阅《民国日报》（上海）1928 年 2 月 13 日、16 日，3 月 2 日，1930 年 1 月 15 日、19 日、22 日，3 月 2 日、3 日、4 月 3 日、5 日、14 日、16 日、18 日、19 日，5 月 19 日、23 日，6 月 25 日，7 月 3 日，8 月 1 日、16 日、17 日、22 日各日的头版。



时，上海电影界的著名女星阮玲玉因绯闻而闹得世间沸沸扬扬之时，也由伍澄宇任其法律顾问，<sup>27</sup>此外同时期伍还在国民外交后援会、工统会、中华法学会、华侨协进会、华侨公会等各种团体中或为成员、或为顾问进行活动，<sup>28</sup>作为律师的伍澄宇可谓如鱼得水。

这一时期，伍澄宇还担任了中韩民族抗日大同盟的主席。这是为了援助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与赵素昂、金九等在上海的朝鲜人组织的团体。<sup>29</sup>但仅凭此并不能立即下结论称伍澄宇“抗日思想非常浓厚”。<sup>30</sup>如下文所述，伍澄宇也与日本人一起参与了旨在实现亚洲人大同团结的东方民族协会等组织。伍澄宇虽然反对日本的侵略，但另一方面又是为了自身目的可以与日本人合作的人物。同时，伍赖以生存的律师职业建立城市生活的基础之上，离开上海的选项对其而言并不现实。当日军占领上海后，这也将伍澄宇逼向进退两难的境地。

## 五、日中战争时期的活动

### 1. 参加维新政府

1937 年日中战争爆发后，次年 3 月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了维新政府。就自己参加维新政府的原委，伍澄宇在二战结束后审判汉奸的法庭上曾有详细的说明。<sup>31</sup>据伍称，1938 年春苏锡文（上海市大道政府市长）与日本的宪兵来找到自己，转达了头山满托其介绍唐绍仪的要求。唐绍仪是中华民国的首位国务总理，当时日军希望由其出面组织维新政府内阁。

同一时期，伍澄宇自身也受到温宗尧（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的邀约，并卷入了树立新政府的工作。但 1938 年 3 月维新政府成立时，伍澄宇拒绝加入，不过 3 个月后的 6 月 24 日，发生了伍澄宇的律师事务所被袭击，两名工作人员死伤的事件。这是重庆国民政府方面的“爱国志士”所为。<sup>32</sup>

那么，伍澄宇为何成为了重庆方面狙击的目标呢。1938 年 6 月的《中央日报》报道称这

---

<sup>27</sup> 《伍澄宇律师受任阮玲玉女士聘为常年法律顾问并代表郑重声明启事》，《申报》1933年2月21日，第5版。《阮玲玉案明日开审》，《申报》1935年3月8日，第11版。

<sup>28</sup> 《国民外交后援会开会纪》，《申报》1927年6月17日，第15版。《工统会聘伍澄宇为法律顾问》，《申报》1928年2月15日，第14版。《中华法学会昨开年会》，《申报》1929年5月16日，第14版。《两团体欢迎华侨代表》，《申报》1929年6月11日，第13版。《华侨公会发起人会》，《申报》1932年11月1日，第14版。

<sup>29</sup> 《伍澄宇关于参加中韩民族抗日大同盟事致法庭密呈》（1946年6月），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26页。另外，从报纸报道中也可确认伍澄宇与朝鲜人的交流。《金澈案余闻》，《申报》1932年12月8日，第9版。

<sup>30</sup> 《首都高等法院审判笔录》（1946年6月18日），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30页。

<sup>31</sup>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笔录》（1946年5月3日）、《伍澄宇辩诉状》（1946年5月4日）、《首都高等法院审判笔录》（1946年5月30日），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00页、第1102页、第1117页。

<sup>32</sup> 伍澄宇：《立法一年之总检讨》，《政治月刊》1卷6期，1941年，第117页。

与伍澄宇组织东方民族补习学校纠集失学青年，以及事务所被袭击前寄给伍澄宇的警告信中提到伍参与的中日亲善补助会组织有关。<sup>33</sup>这意味着袭击的理由正是伍澄宇与日本的关系。根据日本陆军的记录，此时伍澄宇参与了旨在团结亚洲各民族大同团结的东方民族协会。<sup>34</sup>此外，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伍还尝试与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组织大亚洲协会以避免日中之间的战争。<sup>35</sup>这些举动提高了重庆方面的戒心。

据伍澄宇称，当时“敌伪”施加了种种压力，其也曾考虑逃亡香港，但因环境不允许，最终于8月底参加了维新政府。<sup>36</sup>在维新政府成立阶段，伍澄宇曾拒绝参加，可见其态度并不积极。但从上述考察的孙中山死后伍澄宇的主张来看，伍参加维新政府的原因，很可能是出于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 2. 批判蒋介石

实际上伍澄宇在说明维新政府成立的经过时曾对蒋介石有如下批判。“蒋介石于1925年广州之战争，联合苏联，出兵长江，进行北伐，以国民中极少之私人完成党内独裁，迄今已十四年。政治比清朝更为腐败，民国开国之际活跃之忠诚公正之人皆退缩不前，稍有异议，即遭逮捕。建国之大法亦遭破坏，革命同志毫不努力，失睦邻之友好关系，招致国难”。<sup>37</sup>

这一主张与伍澄宇在孙中山死后远离政界也有关联。二战后审判汉奸时，伍澄宇也曾明言对蒋介石“从前（指抗战之前）是不满意”，<sup>38</sup>鉴于此，伍不太可能依附重庆国民政府。

## 3. 内政部县政训练所的讲义与《维新政纲原论》

伍澄宇参加维新政府后，除任立法委员外，还兼任内政部县政训练所及青年团教授。县政训练所1938年9月设立于南京，是培养地方行政官吏的机构。学员分为知事组、佐治组，经6个月的训练后，再进行知事组6个月、佐治组3个月的实习。<sup>39</sup>除了讲授《市政学》、《土地法》，伍澄宇还担纲《维新政府政纲》的讲义，后以《维新政纲原论》之名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伍澄宇依据孙中山的言论解说《维新政府政纲》。伍澄宇在解说政纲第一条“实行三权鼎立的宪政制度，取消一党专政”时，列举了一党专政存在的以下四点问题进行批判，即一、违反民权政治；二、与自由主义冲突；三、议会政治的消亡；四、淡化人民的国家观念。同时援引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指出国民党独裁的问题。伍澄宇认为，国民党独裁的错误之处在于，违反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也会让三权分立或是更先进的基于五权分立的议会政治趋于消亡。伍认为宪政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应在一年之内制定地方自治法规与自治训练纲领。这也符合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的设计，即县的地方自治

<sup>33</sup> 《伍事务所两人击伤》，《中央日报》1938年6月26日，第3版。

<sup>34</sup> 畑部队特务部「支那事变時に於ける支那民心の動向と大民会について」，第27页，1938年10月，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3.29.138，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sup>35</sup> 伍澄宇：《我的中日亲善之基本理论》，《中日文化月刊》1卷6期，1941年。

<sup>36</sup>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笔录》（1946年5月3日），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00页。

<sup>37</sup> 伍澄宇：《维新政纲原论（一名维新政府政纲之理论与实施）》，阳明学会，1939年，第1页。

<sup>38</sup> 《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讯问笔录》（1946年5月30日），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19页。

<sup>39</sup> 维新政府概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概史》，行政院宣传局，第131-132页。

完成后，开始宪政。<sup>40</sup>

伍澄宇的这种解说方式，与维新政府首脑所表述的政权立场有着截然不同。<sup>41</sup>伍澄宇通过《维新政府政纲》，实际上是在贯彻孙中山的主张。这也表明维新政府的内政部县政训练所已不是内政府下辖的一个单纯的教育机构。孙中山主张在完善县政后再实施宪政。如遵循此说，那么作为培养担负地方自治人才机构的县政训练所，很有可能实质上继承了国民政府长期以来的方针。

县政训练所所长为内政部部长陈群一事也可佐证这一点。陈群也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国民政府时代曾任内政部次长，熟悉国民政府的情况。<sup>42</sup>陈群也为伍澄宇的著作作序，其中称伍为“知友”，<sup>43</sup>可以推测应是在了解伍澄宇为人的基础上才特意聘任他的。

#### 4. 大民会与民德主义

在提及维新政府时期的伍澄宇时，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的是其与民德会提倡的民德主义的关系。大民会成立于1938年8月，是维新政府下属的民众宣传团体，之后在整合思想政治团体时提出了民德主义的理论。而民德主义的倡言者就是伍澄宇。

在关于大民会的日本陆军的史料中，虽然未直接提及民德主义的发起人，但记载称：“所谓民德主义，有人称是倡导孙文的三民主义之外，加上民德主义，即为倡导四民主义，中国人自当明白。一部分日本人或云不解其意，或云将其称为主义不佳，但民德为振兴民众道德之意”。<sup>44</sup>从伍澄宇参加大民会的活动，辛亥革命后提倡四民主义，认为民德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等可以看出，伍澄宇的主张与在大民会关于民德主义的说明如出一辙，大民会的民德主义应是出自伍澄宇的提倡。

从上述分析可知，对伍澄宇而言，维新政府的存在超越了与日本“合作一抵抗”的政治力学空间，意外地为其实现辛亥革命以来与孙中山讨论的中国构想提供了试验场所。

#### 5. 参加汪政权

1938年，飞离重庆的汪精卫以实现中日和平为前提开始活动。据伍澄宇称，当时虽接到汪派的褚民谊的信后赴上海，但反对汪精卫成立新政权，自身也希望重操律师旧业。后因环境不佳，在收到汪精卫、陈公博的邀约后，<sup>45</sup>伍澄宇在汪政权时期先后出任立法院委员、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等。

汪政权成立时曾公布《国民政府政纲》，其中第六条为“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

<sup>40</sup>伍澄宇：前引《维新政纲原论》，第37-39页。

<sup>41</sup>拙稿，前引「日中戦争時期中国占領地における将来構想」。

<sup>42</sup>陈群在成立维新政府时，曾反对将国旗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换成五色旗。影佐機関「梁鴻志、汪第二次会谈要領」，1939年7月5日，支那事変ニ際シ支那新政府樹立關係一件/支那中央政權樹立問題（臨時維新政府合流問題連合委員会關係，吳佩孚運動及反共，反蔣救国民衆運動）第四卷（A.6.1.059）外务省外交史料館。

<sup>43</sup>《陈序》，前引《维新政纲原论》。

<sup>44</sup>前引畑部隊特務部，第32-33页。

<sup>45</sup>《伍澄宇答辯理由申訴狀》（1946年5月），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09页。

施宪政”。据此，1940年6月成立宪政实施委员会，<sup>46</sup>决定于1941年1月1日召集国民大会。

<sup>47</sup>据隶属满铁上海事务所法制班的真锅藤治称，其中实际引导实施宪法讨论的是伍澄宇。<sup>48</sup>

伍澄宇在修改有关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规定时表示，目前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只是过渡产物，理想是沿袭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设想。即便如此，但因仅依靠汪政权的统治区域无法达到国民大会召开的法定代表人数，伍澄宇主张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应按照人数，而非县的区划，<sup>49</sup>此外还提出实施有限选举建立雏形，渐进的将《建国大纲》付诸实施。<sup>50</sup>关于三民主义，伍主张既是中华民国诞生之母，也是国民的公有物，不应将其作为国民党的私有物，应将“三民主义国家化”。<sup>51</sup>

关于任教的县政训练所，伍澄宇也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伍澄宇表示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施宪政，有必要完善县政，并指出县政训练所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训练所的科目、学时多，实习少；第二、自县政训练所毕业后当不上县长的仍然很多，但同时也有未上过县政训练所却成为县长者；第三、县长因无固定任期，一旦当上县长即变得只考虑保身。伍澄宇提议，县长不应由各省的民政厅任命，而应由中央政府的内政部、铨叙部任命。<sup>52</sup>

伍澄宇在汪政权的县政训练所担任《国民政府政纲》的讲义（内政部部长陈群也留任），1942年将讲义内容汇总为《国民政府政纲之理论与实施》出版（政治月刊社，1942年）。与维新政府时期的《维新政纲原论》以政治为重点不同，《国民政府政纲之理论与实施》注重于建国，并提及“制宪”、“建军”，这是区别于前者之处。<sup>53</sup>同书中就实施宪政也提出具体的方法，“政府如决定召开国民大会，除在各级民意机关开展选举国民代表工作，还应在和平区域外也秘密进行选举工作，通过调查滞留在和平区域内的区外人士，制作代表者名册”。

<sup>54</sup>

由汪政权成立取代维新政府，并宣称继承国民政府的法统及孙中山遗志，对伍澄宇而言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从其在汪政权时期讨论制定宪法及军队事宜也可看出。但汪政权未受到广泛的支持，1940年底汪精卫便早早决定放弃实施宪政，开始摸索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这种新的国民统合的方法。而原预定的国民大会也被推迟。<sup>55</sup>

## 6. 酝酿战后的动向

<sup>46</sup>本社同人《发刊辞》，《宪政月刊》1卷1期，1940年，第3页。

<sup>47</sup>徐良：《我对于国民大会的意见》，《宪政月刊》1卷4期，1940年，第12页。关于汪政权实施宪政的具体内容，笔者拟另搞讨论。

<sup>48</sup>真锅藤治「憲政運動と支那内政問題」，『大陸』4卷2号，1941年。

<sup>49</sup>伍澄宇：《我们对于国民大会的意见》，《宪政月刊》1卷4期，1940年，第19-20页。

<sup>50</sup>伍澄宇：《予之制限选举论-与江君选民政治之商榷》，《民意》1卷8期，1941年。

<sup>51</sup>伍澄宇：《三民主义国家化的理论》，《中央导报》1卷18期，1940年，第6页。

<sup>52</sup>伍澄宇：《宪政与县政》，《政治月刊》1卷1期，1941年，第37-38页。

<sup>53</sup>伍澄宇：《自序》，同《国民政府政纲之理论与实施》，政治月刊社，1942年。

<sup>54</sup>伍澄宇：前引《国民政府政纲之理论与实施》，第80页。

<sup>55</sup>关于汪政权的宪政实施，笔者拟另稿探讨。

据山县初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小矶国昭的同期，著名的中国通）称，1944年8月伍澄宇曾向受小矶之托访华的山县称，“日本再三宣称中国是东亚联盟的成员之一，两国国民必须如骨肉般同甘苦，完成黄色人种的伟业，但言不符实”<sup>56</sup>，对日本进行了批评。此外，据记者木村英夫表示，同年9月伍澄宇曾向其透露，有必要“让不属于重庆、南京两政权的纯粹的第三势力挺身而出，完成收拾时局的重大使命”，而中国已做好相关的准备。<sup>57</sup>伍所指的第三势力具体为何仍不清楚，但立场应是既非重庆的“抗战派”也非南京的“和平派”的立场。<sup>58</sup>

伍澄宇此时应已预料到日本的战败，开始设想新情况的出现。这从其同一时期构想克服国联的问题成立新的国际组织，<sup>59</sup>以及与陈中孚等组织上海特别市地方自治协会，旨在推动地方自治，实施宪政的活动也可见一斑。<sup>60</sup>

### 7. 汉奸审判

日本战败后，伍澄宇遭到重庆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逮捕。汉奸审判中，尤为重视出任“伪职”的事实，这自然不限于伍澄宇一人。因此，在法庭上伍的申辩也主要围绕着“伪职”的空有虚名以及自己如何具有“抗日”精神展开。

关于前者，伍澄宇主张立法院只是形式上的审议机构，实际的外交大权由中央政治委员会掌控，而自己担任“伪职”期间，主张民食救济、保护华侨、收回租界，并反对法币贬值和粮食的统制。<sup>61</sup>

关于后者，伍澄宇对如何解释自己的“抗日”态度煞费苦心。例如在最初审判时，伍澄宇就1938年律师事务所被袭一事称，“……打坏我律师事务所，死了一个书记，打伤一个茶房。被敌伪种种压迫，我想逃到香港……”，极易造成受到了维新政府方面攻击的印象（实际为来自重庆国民政府方面的狙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汪政权时期的1940年伍澄宇尽力营救被日军俘虏的重庆方面军人所作的“伍先生其实是爱国志士”的证言无疑是一剂强心剂。<sup>62</sup>但一个月后的审判中，法官指出1938年伍澄宇律师事务所被袭是“爱国志士”（重庆方）所为，伍澄宇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法

---

<sup>56</sup> 山县初男著、中国刊行会编：『中国』，三原朝雄发行，1967年，第171-172页。

<sup>57</sup> 木村英夫：『敗戦前夜』，佐藤咲代，1993年，第612-614页。

<sup>58</sup> 与此论调相同的是，出现了通过赋予人民言论自由，期待“高明之士”代替现有政府登场的言论（胡兰成：《瞭解的起点》，《中日问题与世界问题》，大楚报社，1945年）。有关胡兰成的讨论，笔者拟另稿探讨。

<sup>59</sup> 伍澄宇：《世界和平之路（一名世界国联政府大宪章草案）》，阳明学会，1944年。

<sup>60</sup> 《地方自治协会 开发起人会议》，《申报》1944年10月15日，第2版。

<sup>61</sup> 《伍澄宇致最高法院申请复判状》（1946年7月10日），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34页。

<sup>62</sup> 《李子和等为伍澄宇曾“营救”被日寇捕获之战俘致首都高等法院呈》（1946年5月27日），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15页。

官进而质问其受袭后也不前往重庆的理由。<sup>63</sup>之后，伍澄宇吐露了 1932 年中韩民族抗日大同盟的事实。伍澄宇称之前秘而不宣的原因是避免为韩国的同志带来麻烦，而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自己的“抗日思想”。<sup>64</sup>

除此之外，伍澄宇还以汉奸定义的问题及刑法为依据，力主自己无罪。伍澄宇表示，“就法律形式言，伪府为日寇支持，则凡与日寇直接、间接关系，似概得认为有奸的行为。但就法律实质言，不能以与日寇来往，即以其行为是奸的，要在（看）其行为是否有危害国家及民族为断”，<sup>65</sup>抗议轻易将其定为“汉奸”。

针对其曾宣传奴化教育的质问，伍澄宇称“我所讲的都是三民主义一类”，<sup>66</sup>主张自己的清白。虽然不可否认这是法庭上辩解战术的一环，但从其在维新政府、汪政权时期的言论来看，其教授的都是“三民主义一类”应是事实。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尽管伍澄宇在日中战争前已与日本人有交往，并组织团体，但在审判中几乎完全未提及。既不说假话，也不说多余的话，这是伍在法庭抗辩时采取的战术。然而，伍澄宇的拼命辩解并未收效，审判中将伍自维新政府以来，历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各委员长等“伪职”，在立法院通过中日基本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对英美宣战案等列为罪状，1946 年 6 月南京的首都高等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 12 年，褫夺公权 10 年。<sup>67</sup>

## 六、结语

### 1. 维新政府、汪政权对伍澄宇的意义

本文剖析了伍澄宇自辛亥革命前在美国、东南亚从事革命运动的活动及主张，考察了与其在日中战争时期活动的联系。辛亥革命前后，伍澄宇是孙中山身边的亲信，可向孙直抒己见。但因阔别中国近 10 年，长期在海外活动，以及孙中山的去世，伍澄宇之后远离了政界。在汉奸审判中，其也声称“对蒋主席有不满”，对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也有不满。这种心情与孙中山奉安大典上被孤立的老革命家陈少白，<sup>68</sup>在该大典之后的宴席上辛亥革命亲历者批判国民政府现状的“悲愤慷慨”之情极为相似。<sup>69</sup>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这种自尊很有可能长期成为他们看待政治时的出发点，认为自己贡献于辛亥革命的理想越高，就越会对之后的中国政治感到恨铁不成钢。

当然，伍澄宇也并不认为维新政府、汪政权是中国理想的政权。其自身当初也拒绝参加

<sup>63</sup> 《首都高等法院审判笔录》，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17页。

<sup>64</sup> 《伍澄宇关于参加中韩民族抗日大同盟事致法庭密呈》（1946年6月），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26页。

<sup>65</sup> 《伍澄宇辩诉状》（1946年5月4日），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03-1105页。

<sup>66</sup> 《首都高等法院审判笔录》，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18-1119页。

<sup>67</sup> 《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6年6月24日），前引《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131页。

<sup>68</sup> 犬養健：『揚子江は今も流れている』，中公文庫，1984年，第32-34页。

<sup>69</sup> 近藤達児：『新支那旅行記一附孫文移靈の記』，田口書店，1929年，第41页。

“伪政府”，最终不得已加入也是出于保命的目的。<sup>70</sup>但另一方面，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伍澄宇都尽可能的阐述自己的政见，积极的想要付诸实现。伍的这种态度，应是受其讲授的阳明学志向的影响。考虑到伍澄宇在维新政府、汪政权时期任教于内政部县政训练所，并将讲义出版，同时宣扬三民主义国家化等，很难想象当时的活动完全是被动的。尽管处于日本占领下的这一限制，但伍澄宇还是尽可能去尝试实现自己的理想，伍对汉奸审判中将自己称为“失意政客”的说法也表示了强烈反对。<sup>71</sup>

关于参加维新政府、汪政权人们的态度，尤其是在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往往会指出他们无力、被动的侧面。笔者不否认的确有这部分人的存在，但伍澄宇的事例中并不能反映出这样的气氛。毋宁说是其虽在日军的限制下，但将维新政府、汪政权视为可改造中国政治课题的一个场所，以实现自己理想中的政治状态。事实上作为占领者的日本，只要在保证对日和平的前提下，几乎对中国的政体、组织的形态漠不关心（或可说并无统治中国的具体策略<sup>72</sup>）。从伍澄宇的行动也可看出，维新政府、汪政权这种政治体制的存在，也为不容于国共的人们在讨论中国将来时提供了一片空间。

## 2. 战后的活动

最后就伍澄宇之后的情况略作介绍以为本文作结。1947年4月，伍澄宇被减刑为有期徒刑8年，褫夺公权8年。<sup>73</sup>这应是伍澄宇的妻儿不懈辩解的影响。两人强调伍澄宇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以及比较了汉奸审判中与其他被告的量刑，声称对伍澄宇的判决是不当的。<sup>74</sup>

之后，伍澄宇被假释，1949年4月移居台北。但1950年4月，因试图前往北京而再度被逮捕，同年8月以叛乱罪处以10年徒刑，并因保释5年内再犯刑期加长至15年。

但伍澄宇并未停止笔耕，在监狱中他也不断的撰写文章，共著书30余册。<sup>75</sup>其中《三民主义之反共原理》（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年）中称，“世界如信奉三民主义，民主主义国家不仅能避免爆发冲突，共产主义国家也能和谐互助”，《五权宪法撰言—宪法修正研讨理由书》（出版社不明，1960年）提及国民大会的权限有必要扩大至立法，质疑国民大会代表的收入过高，提出须在市县一级实施直接选举。在《三民主义之自由原理》（张铁君等《三民主义的自由论》，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中，伍指出民主自由的政治建设讨论自孙中山肇始，但问题在于时至今日三民主义仍未被理解，总理遗训也被误解，以致政党化。伍澄宇一直以行动在宣扬“三民主义”。

对伍澄宇而言，战后中国大陆及台湾的政治状况并不让人满意。当然，伍澄宇也有将自

<sup>70</sup> 《伍澄宇答辩理由上诉状》（1946年5月），前引《审判汪伪汉奸笔录》，第1107-1108页。

<sup>71</sup> 同上。

<sup>72</sup> 参阅拙稿「西村展蔵と上海市大道政府」，『近きに在りて』52号，2007年。

<sup>73</sup> 《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1947年4月5日），前引《审判汪伪汉奸笔录》，第1144页。

<sup>74</sup> 《伍劳伟卿致最高法院声请复判状》（1946年7月17日），《伍伯英为伍澄宇案致最高法院辩护状》（1946年8月19日），前引《审判汪伪汉奸笔录》，第1139-1144页。

<sup>75</sup> 《监察院纠正军法案伍澄宇王群艺李华栋等叛乱等罪行复判情形》，国防部档案0039-3132055-55，国家档案管理局。

己的理想假托孙中山进行灌输的一面。在孙中山的主张中，伍澄宇重视的是《建国大纲》，尤其是其中县政代表的完善地方政治，这也体现在他一贯批判专政的意识中。为了克服独裁，由国民参政实施宪政是不可或缺的，但依据《建国大纲》，达成这一目的前必须先在县政一级实现国民参政。

1960年伍澄宇出狱，1962年11月12日因脑溢血在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病逝。次日的《中央日报》将伍澄宇称为“革命老人”，以一则短讯报道了他的去世。<sup>76</sup>

---

<sup>76</sup> 《伍澄宇病逝》，前引《中央日报》。



# 文革后期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胎动

八塚 正晃

(庆应义塾大学)

## 一、问题的所在

在回顾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发展历程的时候，对于以对外经济交流活动为杠杆，谋求现代化的对外开放政策<sup>1</sup>的重要性，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一般认为，中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加以提倡，始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混乱结束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推进这一方针的国际环境就已形成。这是因为，中国经过1971年中美关系缓和、中国获得联合国代表权之后，摆脱了国际孤立，开始与许多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前期围绕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政治的展开的关系为主题，进行研究。

众所周知，由于受到上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于1975年提出了现代化的方针。在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国政府从1972年开始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建交谈判一并进行的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该计划由于在政府内部的草案中引进总额达到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扩大对外贸易的方针是，在1975年前的不到5年中，让贸易总额增加到3倍，打破文革的半锁国状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编，1984：IV-3）。另外，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了后来与对外开放一起提倡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支撑现代化方针的对外开放政策的萌芽。

尽管如此，当时的中国国内，一直进行文革的政治斗争，这种对外开放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支持。近年来有关文革的代表研究（高，2003；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2006；益尾、2010；Vogel，2011），对于阐明最高权力的政治动态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对于上述经济

---

<sup>1</sup>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解释，所谓对外开放，是指“与外国的各种经济交流活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引进技术、对外业务合作、国际旅行、对外援助等）”，一般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加强对外交流的基础上推进经济发展的总方针”（叶，2009：50 - 51）。对外开放一词，并不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中国国内流传开的，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中，从1974年起就开始使用该词，正如“改革开放”一词自1984年开始在人民日报上使用一样，中国政策的形成时间与政策作为口号和政治路线被传播的时间未必一致，因此本文提到的对外开放，着重于政策形成的一面，指的是以扩大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引进为杠杆，谋求实现近代化的政策方针。

政策，则描述为出于政治斗争需要的、短暂的政策<sup>2</sup>。例如，泰韦斯等人研究认为，毛泽东一方面委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实务派”重建经济，一方面又允许要求继续走激进的革命路线的四人帮<sup>3</sup>进行政治运动，因此包括四三方案在内的各项政策没有带来像邓小平改革那样的成果(Teiwes and Sun, 2007:49-53)。结果，中国作为政治路线寻求对外开放，不得不等到毛泽东去世和逮捕四人帮以后。

那么，为什么在1971年以后中国的对外环境发生了客观的变化，而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有必要研究一下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的政治动态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上述的先行研究，往往过于重视国内的政治动态，而忽略了领导人随着国际环境变化而产生的认识变化以及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因而对于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并为邓小平等人所继承的政策持续性的一面以及毛泽东如何评价对外开放的各种论点，仍然留下了值得探究的课题。

尽管存在一些与本文探讨的四三方案有关的研究，但它们仅仅停留在描述反映上述政治构造，作为周恩来进行经济重建的一环而受到政治斗争影响的过程（史·李，2008），或者介绍其引进过程。鉴于四三方案的规模，可想而知其对产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尚未有人对与四三方案相关的各项政策进行充分的分析。

笔者认为，根据以上课题，在分析这一时期围绕四三方案的一系列政治历程的时候，需从一直以来并未充分考虑的、结合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政治的展开的两个视角来加以把握。第一个视角聚焦于四三方案与工业化战略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中国，时刻准备战争，重点放在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上，采取的是将产业设施分散到内陆地区的三线建设<sup>4</sup>所代表的内发性的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在1973年7月修改第四个五年计划后，才发生转变。工业化战略为什么被转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解释这一问题，对说明形成面向对外开放的政策非常重要，而且，将会引发对中国经济史上四三方案和修改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意义的重新探讨。

第二个视角聚焦于毛泽东的对外战略与四三方案所代表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关系。所谓毛泽东的对外战略，由以下两个要素构成：在理念上，继续革命外交路线，同时在现实上，建

---

<sup>2</sup> 益尾、傅高义等人的研究对阐明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过程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焦点集中在邓小平身上，强调毛泽东移交权力后的政策转变，因此对毛泽东执政下实务派推行的各项政策的探讨不够充分（益尾2010；Vogel, 2011）。对此，本文侧重于1971年后对外环境与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并阐明了与邓小平改革的连续性。

<sup>3</sup> 所谓“四人帮”，是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文革中采取激进路线的势力。在1973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四人帮全体成员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与周恩来为首的实务派进行政治斗争。

<sup>4</sup> 所谓“三线建设”，是指为了准备打仗而将战略设施和军事设施的布局分散到内陆地区等地方。从1964年起开始实施，在林彪掌权的过程中，这个方针不断得到强化。作为地区，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内陆后方为三线。详情请参照下文(Naughton, 1988;丸川, 1993;吴, 2002;陈, 2003)。

立对抗苏联威胁的国际统一战线。周恩来等人实行的各项政策，是以其中的毛泽东现实一面的对外战略为前提推动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本文中阐述，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开展国内政治斗争（批林批孔运动），与其说起因于国内问题，不如说起因于，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毛泽东的理念上的革命外交路线与对外开放政策之间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因此，探讨毛泽东的对外战略与对外开放政策之间的关系，对于回答为什么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国际环境已经具备，反而在国内经历了伴随政治斗争的过程，并从立体上把握文革时期对外开放的地位，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

本文旨在，通过从工业化战略、毛泽东的对外战略的关系这两个视角分析围绕四三方案的政治历程，阐述文革后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情况和制定这一政策的构图。另外，本文的分析还将为重新探讨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形成进程中国际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提供材料。下面，在第Ⅱ节中，将概述1972年前后中国国内外的情况，阐明是在怎样的考虑下作出了四三方案的构想。接着，在第Ⅲ节中，将通过分析与实施四三方案同时进行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修改，探讨四三方案与工业化战略之间的关系，阐述对外开放政策形成的过程。第Ⅳ节将通过论述对外开放政策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定位，探讨国内的政治斗争（批林批孔运动）与四三方案的关系，阐明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经过。

## 二、对外开放的背景和逻辑

围绕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政治，在1972年前后出现了重要的转机。下面，将梳理这些变化，同时阐述在中国领导层中起草四三方案的背景。另外，将提取四三方案起草过程中的特点，阐明领导人推进四三方案的逻辑。

### 1.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由于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摆脱了国际上的孤立状态，致力于对抗苏联的威胁。在此之前的围绕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如周恩来的话所说，处于有可能“苏联从北面，美日从东面，印度从西藏”进攻的四面楚歌的状态（NSA：18-19）。其中，对中国来说，最直接的威胁是苏联。这是因为，中苏对立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公开化，到1969年激化，甚至在中苏边界发生了军事冲突。从这个观点来看，中美关系随着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得以和解，对于中国来说，是重新制定了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的统一战线战略。1973年2月毛泽东向基辛格提出的““一条线”战略”，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把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抗苏联，形成国际统一战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469）。

上述国际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附带的效果，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在此之前，中国一直都忙于应对严峻的国际环境，致力于内发性的工业化发展，考虑准备战争。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之后，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对于中国来说，从东南部进攻的可能性下降，这就为对外开放沿海地区创造了可能。

如果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作为讨论四三方案的背景，以下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围绕

文革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要求重建经济的周恩来等人权力扩大。1971年9月，发生了所谓的林彪事件，被作为毛泽东继承人的林彪发动政变失败，并离奇死亡。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进行批判林彪等人势力（主要在军队）的政治运动（批林整风运动），同时给周恩来委托了许多权限（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339-347）。由于这项举措，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国务院的权力相对增大。另外，在周恩来的周围，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恢复中央领导职务的邓小平、陈云以及新进中央的华国锋等参加的国务院业务组<sup>5</sup>和主管经济计划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称国家计委）为中心，形成了推进对外开放的势力。本文将他们称为“实务派”。这一势力主导了国务院所主管的有关外交、经济的决策，他们在扩大对外业务、恢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的职务的同时，扩大了势力。不过，他们主导决策的权限，完全在毛泽东“几乎绝对的控制”之下，仅限于党中央许可的范围内（Teiwes and Sun, 2007:6）。另外，由于林彪等人在军队中失败，实务派填补了权力的空白，他们的崛起意味着，会引起在文革政治斗争中，尤其在文化和宣传领域扩大了权力的四人帮等激进派的反对（史·李、2008:62-77）。

第二，毛泽东开始重视国民经济领域，作出了发展纤维产业的指示。正如从毛泽东积极推进三线建设也可以看到的那样，本来毛泽东的工业化方针侧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而不是农业和轻工业。加上文革时期政治经济的混乱，阻碍了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生活资料的发展，国民经济处于疲软状态。但是，毛泽东在1971年8月至9月进行地方视察的时候，认识到纤维产业落后的现状，因而，在林彪事件后对周恩来和李先念作出了采取措施的指示（《李先念传》编写组编，2009:763-764）。针对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提出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化纤成套设备的建议。这个建议正如下面看到的那样，在国务院讨论的时候发展成了四三方案。

## 2. 四三方案的起草及其意图

在接到毛泽东指示之后，国务院展开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成套设备的讨论。1971年12月，周恩来在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办的会议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并不是都不好”，开始着手在国内达成统一意见的基础上，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501-502）。第二年1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设备的报告》，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李先念传》编写组等编，2011:169-170）。不过，此时设想的只是化纤和化肥成套设备，引进的金额仅仅4亿美元。

这项引进成套设备计划在1972年有了大幅度的扩大。在同年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开始为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了解，各部门和地方不断提出派遣海外视察团和扩大项目的要求（陈，2

<sup>5</sup> 国务院业务组是文革中临时成立的、指挥国务院各部门工作的组织。以周恩来和李先念为核心，由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栗裕、苏静、方毅等人组成，后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又加入华国锋、陈云、邓小平、谷牧，是负责恢复经济秩序和制定四三方案的核心机构。国务院业务组于1975年1月解散，许多成员就任副总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地，2011：255 - 256）。

005:11-12)。鉴于这些要求，加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建交取得进展，中国政府在1972年9月组建了以国家计委为中心的成套设备进口领导小组，决定在调查成套设备引进和中长期经济计划的整合性的基础上，大幅扩大引进规模（史·李，2008:296）。这样，1973年1月起草了引进金额为43亿美元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指示报告》（四三方案）。而且，在此过程中，引进技术的对象不仅仅是最初计划的化纤和化肥，而是扩大到了连续式轧板机、化工、天然气、发电站等各类生产设备。

从以上情况可知，四三方案与最初设想的内容相比，变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项目。规模变大的背景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还有来自地方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也是反映了周恩来和李先念等实务派意图的一个结果。实务派的意图是什么呢？第一，他们旨在通过四三方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从而加快自己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根据四三方案的报告，其目的是，“引进新技术，支援农业，强化基础工业和轻工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中国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04a：12-13）。同一时期，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介绍了“农业的根本在于机械化”这句毛泽东的话，说明其理由是，如果农业得不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工业发展就不会发展（资料3）。另外，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不断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作为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有助于扩大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也受到了重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9:302-307；雷，2006:132-135）。通过四三方案支持农业和轻工业，与以前三线建设的方向性明显不同，正如后述那样，迫使国家对整个工业化战略作出了调整<sup>6</sup>。

第二，他们企图通过扩大对外贸易，提高本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关于这一点，四三方案的报告作了如下评价：“我们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积极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国际政治的斗争，也有利于加快国内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04a：12）。这里所说的“国际政治的斗争”，主要指的是对苏战略。周恩来在1973年3月党内进行的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中，把“在工农业、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吸收各国的先进技术，实现大跃进”列为对苏战略目标之一。这个战略目标，是在“当前，苏联的战略关切在欧洲和中东”，只要中国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苏联对中国就只是虚张声势”，“当前是‘冷战’，是外交上的‘舌战’”这种形势认识的前提下提出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1978:359-360）<sup>7</sup>。

<sup>6</sup> 当时，国家非常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但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从长远观点出发，也开始出口矿产品、机械等，提升出口产业的水平。时任对外贸易部部长的李强在1974年全国外贸出口计划会议的讲话中表示，短时间内，仍以农产品、特产等加工品为主要输出口，但今后还要重视矿产品，提高石油、煤炭、小型成套设备、机械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对日本、欧美国家的出口（资料4）。

<sup>7</sup>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表示，苏联在西部战线部署了111个师，在中亚部署了20个师，在中国边境附近部署了40个师，鉴于苏联军队的部署情况，说明苏联的主要战略地区在欧洲，只要中国备战，苏联除了在中国边境附近发生军事冲突外，不会与中国发生战争。毛泽东也在1972年7月作出了与周恩来同样的分析（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44）。

从以上内容也可以看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四三方案同时追求以下两个目的：在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它是多元化的对苏战略的一部分；同时，在可以避免与苏联全面战争的时期，通过引进技术，推动以国民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意图，引进技术计划发展成了大大超过当初设想的大规模项目，亦即四三方案。不过，这一引进计划的金额超过了当时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不可避免地对整体的工业化方针产生了影响。这一点将在下面探讨。

### 三、对外开放与工业化战略的关系

把上面看到的四三方案，仅仅理解为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是不妥当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四三方案的方针与以往的工业化战略本质上并不相容，而且从其规模来看，必然会对总体的工业化方针造成影响。实际上，配合四三方案的起草，中国政府修改了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意味着工业化战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本节内容，为了掌握当时的情况，首先梳理围绕第四个五年计划修改的论点，在此基础上，从组织政策、建设投资、贸易政策三个侧面分析四三方案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关系。

#### 1.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修改经过

首先，我们确认一下有关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机构职能分工。主管五年计划起草工作的，是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直接管辖的国家计委。另外，许多实务派政治领导人参加的国务院业务组，负责指导国家计委的经济计划，协调各部委的政策。由这个国务院的中枢机构制定的计划，在年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由中央及地方的干部进行审议。第四个五年计划本来是在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势力对经济建设有重大影响力的1970年制定，并于次年开始实施的。因此，第四个五年计划反映了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以准备战争的三线建设工作为中心，按照重点投资国防工业、重工业、内陆地区的工业化战略而制定的。

林彪事件后，开始对这个第四次五年计划进行重新讨论，而其论点起初主要是批判林彪等人参与的三线建设工作的效率低下问题，逐渐变化为修改整体的工业化方针。1972年1月，在林彪事件后的首次全国计划会议上，余秋里按照批判林彪的要求，对三线建设进行批判，批判省级的大中型投资超过计划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提出对三线建设进行重新讨论（陈，2003：241）。在这里，重点放在批判林彪上，而没有明确说明重新讨论的内容。随着前一节所述的技术引进计划发展成为四三方案，这种重新讨论的观点开始波及到整体的工业化方针。从1972年8月至11月，国家计委指出三线计划不合理，同时提出了缩小国防工业、纠正投资地区和产业结构的平衡等有关总体工业化方针的建议（史·李，2008：265）。接着，在四三方案获得批准后召开的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上，中央和地方干部试图就新的工业化目标形成共识（资料5）。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国家起草了第四次五年计划的修改草案，并在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批准。同年7月，《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正草案）》完成。那么，这个修改实际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下面，从组织政策、建设投资、贸易政策等各个方面进行探讨。

#### 2. 形成依靠对外开放的工业化战略

### (1) 组织政策

在上一节中，作为四三方案的背景，提到了林彪事件后的权力转移，这项工作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通过以军队为中心，对国家和党的机构进行组织改革，实质上完成了。关于此次组织改革，一般强调周恩来等实务派纠正林彪等人在文革前期实行的激进政治，也就是“脱林彪化”的一面。另一方面，共产党史研究中指出，林彪重视国民经济，更接近于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高，2003：269）。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批林整风运动，在调查林彪事件的同时，也可以看作是通过把以往的政策方针归于林彪并进行批判，从而将方针的急剧转变加以正当化的一场运动。虽然由于资料有限，林彪的实际政治立场尚存在许多不明之处，但在下文中，将通过探讨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是以什么样的目的进行组织改革的，来考察组织改革在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联系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次组织改革的背景在于，文革前期中国的政治体制走向了军事化。在196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中人民解放军代表的比例达到了45%（MacFarquhar，2011：247-260）。人民解放军的势力在文革初期推动的、所谓“三支两军工作”的政治体制军事化的运动中，对国务院各部门、地方政府组织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通常认为，他们对于推进重视有权的国防工业的三线建设工作，亦持积极的态度。

对上述情况的拨乱反正，即阻止政治体制的军事化、强化国务院对经济政策的权限，正是组织改革的目的。周恩来与取代林彪领导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叶剑英合作，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开展了对林彪事件的调查，并推动了组织改革。1972年8月21日，中央撤销了前述的“三支两军工作”，以防止政治体制的军事化。与此同时，逐步推动削弱解放军在经济政策上的权力，同时强化了国务院、国家计委的权力。1973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后，国家计委对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工业领导小组<sup>8</sup>和其办公室拥有与国务院、国家计委同等的权限一事提出批评，次年9月国务院开始取代中央军事委员会主管国防工业办公室（资料6；《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1986：340）。与此同时，国务院加强了对地方的宏观控制（国分，2004：160-161）。

另外，组织改革具有“脱林彪化”的一面，同时它也是为了推动对外开放，可以说是为了政策过渡而实行的改革。例如，在人事方面，国家把支持对外贸易的人员安排在了负责经济建设的重要部委。周恩来任命1971年3月被撤销职务的谷牧为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与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一起，负责管理经济建设（谷，2009：265-273）。另外，在作为经济政策核心的国务院业务组中，除了谷、余二人以外，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从1973年开始华国锋被提拔为副组长，再加上陈云、邓小平等人，增大了实务派的势力。除了这些人事以外，还开展了思想教育。例如，中央1973年3月在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召开批林整风座谈会，批判林彪的外交路线是锁国政策（闭关自守），实施了把对外经济交流正当化的各种思想教育

---

<sup>8</sup> 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是针对本来由国务院国防工业部门管辖的事务，为了加强军队统一领导，而于1969年12月成立的组织。下设航空、电子、武器、造船四个管理小组，领导与国防有关的工业部和研究机构。由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等亲近林彪的军人担任各小组的负责人（陈，2003：223）。

(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1978 : 373)。通过这一系列强化国务院权限和思想教育, 使已经处于实施中间阶段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修改为把重点放在对外开放上成为可能。

## (2) 建设投资

那么,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修改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简单地说, 它意味着, 国家在产业方面的国防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 还有在地区方面的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 调整了建设投资, 分别将重点转向了后者。下面, 对这一点进行探讨。

第一, 对国防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投资被认为具有交易的性质, 强调对农业、轻工业的支持。在1972年11月由国家计委组织召开的经济计划会议上, 讨论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有人指出, 由于过度强调国防工业的发展, 导致经济建设投资减少, 影响到了其他工业、农业的发展(陈, 2003 : 242)。接着, 次年3月国务院内部提出了应该通过减少对国防工业的支出, 增加对农业、基础工业的投资, 从而加快经济建设发展的建议(资料6)。这一建议反映在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修改内容上, 国防工业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原来的7-8%下降到了6.2%(陈, 2003 : 246)。虽然工业之间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但可以确认的是, 它与侧重农业和轻工业的四三方案的方针是一致的。

第二, 三线建设的一个特点是将内陆地区作为重点投资对象, 但计划修改后, 将投资重点转向了沿海地区。这个转变非常迅速, 许多内陆地区的三线建设项目被中止或者作废(Naughton, 1988 : 362)。结果, 三线建设虽然依旧作为一个口号, 但其定位实质上大幅下降(丸川, 1993 : 82)。确实, 从不同地区的投资比例来看, 沿海地区的投资从1971年的27.7%大幅增长到了1975年的42.2%, 与之相对, 内陆地区的投资从30.9%减少到了20.5%(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 1987 : 104)。

沿海地区的投资主要用于建设港口<sup>9</sup>。这是因为, 由于中国与日美间的关系得到改善, 东南沿海地区遭到军事侵略的可能性降低, 加之当时采取了扩大贸易的方针, 海运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制定四三方案后的1973年1月, 李先念通过对外贸易部向上级汇报了港口货物运输交货期延迟、管理不善的问题, 并提出应尽快解决(《李先念传》编写组编, 2011 : 194)。为此, 周恩来在随后的国家计划会议上提出“三年内改变港口面貌”的口号, 并在国务院成立了港口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谷牧), 加快推进港口建设(谷, 2009 : 267-268)。结果, 到1975年末为止的三年间, 中国建成了48个拥有万吨级码头泊位的港口, 超过了建国后建设的全部港口。而且, 货物吞吐量增加了5500万吨, 达到了1972年的1.5倍(谷, 2009 : 270-271)。

## (3) 贸易政策

如上所述, 通过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修改, 中国试图从三线建设转向以扩大对外贸易为前提的工业化战略, 但是为了大规模推动这项变革, 筹集资金是一个问题。四三方案(51.2亿美元)的财政负担达到了1973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317.7亿元, 1973年的外汇汇率为1美元=

<sup>9</sup> 海运基础设施占全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比例, 在1965年之前基本低于10%, 但是到1975年上升至33%, 投资额也从1.3亿元增加至22.9亿元(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 1987:101-102)。



2元)的3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 2005 : 21) 。

一方面,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一直为归还苏联债务而苦苦挣扎, 因此中国当时的基本立场可以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概括: “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 完全靠自力更生”, 国家禁止外债 (顾, 1992 : 604) 。实际上, 1973年1月, 当时的对外贸易部长李强拒绝了日本通产大臣中曾根提出的延期付款结算的建议 (紫, 2004 : 363-364) 。

另一方面, 为了实现需要大规模资金的四三方案, 解除对内债、外债的禁忌必不可少。1973年2月, 周恩来就购买外国船舶一事, 指示利用中国银行的贷款, 首先放宽了内债的限制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97 : 581) 。另外, 在外债方面, 主管经济政策的陈云受周恩来的委托, 从这一时期开始, 领导对外贸易部推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筹集制度, 并于8月将结果汇总成了一份报告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00 : 176-177) 。按照这份研究成果, 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资金采取了延期付款方式, 并利用香港和澳门的中国银行的外汇存款以及外国银行的同业贷款, 充当进口资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2004a : 19-22) 。正是由于建立了这样大胆的投资体制, 才导致了后来贸易进一步扩大和接受贷款, 由此来看, 它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如从本节探讨的各项政策看到的那样,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修改无疑是对在朝鲜战争后确定方向, 在文革过程中得以强化, 侧重发展重工业、军事产业和内陆地区的内发性工业化方针的一种转变。它的方向是, 以引进先进技术为杠杆, 发展轻工业、农业, 从而促进国民经济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长期来看, 是扶持出口优势产业的同时实现现代化。我们可以理解为, 为了落实这一转变, 在组织方面强化了国务院对经济政策的权限, 在贸易方面推动了资金筹集制度的调整。

根据中国经济学家诺顿 (Naughton, 1994 : 50-51) 的研究, 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政策的根本变化可以总结为以下6点。即: ①抑制建设投资, 促进消费; ②投资从单一的重工业转向多元化的产业; ③非军事化; ④从自给自足、重视内陆地区转向重视沿海地区; ⑤进入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 ⑥重点从国防转向提高生产力。如果将这些变化视作为对外开放而采取的经济政策, 那么, 除了非军事化以外, 中国已经从1973年开始作为工业化战略开始着手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换言之, 可以说, 1978年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政策继承了以上方针, 在理论上将其正当化, 推动了根本的改革。

尽管如此, 本节中所见的一系列政策, 并非周恩来等政治领导人为了推进对外开放政策, 有着周到细致的设想而实行的。也许应该看作, 这些政策是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寻求对外的“一条线”战略和国内的经济重建而实行的应对政策, 但是结果, 这些政策可以评价为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 这一时期的各项政策都是过渡性政策。例如, 在产业政策方面, 尽管四三方案采取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工业化方针, 但从1975年开始, 石油产业和钢铁业等重工业的现代化逐渐受到重视。到了1977年, 再次提出了遵循这一方针的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计划 (即所谓的“六五方案”) (资料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2004b) 。另外, 关于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虽然这一时期重视计划经济的效率性而强化了国务院的宏观调控, 但在邓小平时期, 在扩充市场调控作用的思想下, 推动了包括国务院让权在内

的一系列体制改革。

#### 四、对外开放与毛泽东的对外战略

然而，上述各项政策在1974年时遭到了政治动荡的影响。从拟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修正草案的1973年6月开始，领导层内部开始了对周恩来的批判。到了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全国政治斗争中，扩大贸易的方针遭到了批判。尽管上述各项政策是经过党中央的批准，被视为对苏战略中的一环，但为什么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政治运动呢？关于批林批孔运动，人们关注的是四人帮对周恩来等实务派发动的政治斗争这一面。但是，对这一事件的趋势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是毛泽东。因此，在本节中，根据这一情况，将首先探讨毛泽东对于对外开放政策的态度，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政治的混乱之间的关系，然后，阐述对外开放微妙地改变了逻辑，党内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过程。

##### 1. 毛泽东追求革命路线与对外开放政策

毛泽东对于对外开放的各项政策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在中美关系缓和以后，毛泽东曾说：“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从这句话可知，他降低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想要通过“一条线”战略的外交努力，对抗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4：597）。根据这种认识，在国内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推动经济建设。因此，毛泽东的基本认识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既是对苏战略的一环，也有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与周恩来等实务派的想法是一致的。另外，这也体现在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这句话中（资料1）。

但是，这仅仅是毛泽东的对外战略的一面，未必意味着，他完全支持对外开放。第一，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旨在，利用美苏间的矛盾，来提升本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因此，接近美国不过是对苏战略的一个过渡性的手段，而当时西方国家也同中国一样，需要与苏联对峙。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如果东西方冷战的僵持局面发生变化，那么将要重新考虑中国是否有必要接近西方国家。第二，毛泽东强调，中美关系缓和不影响中国支持世界革命斗争的立场，中国仍将继续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地主义开展斗争（Yang and Xia, 2010：407-410）。他认为，中国接近美国是与美国人民合作，而并非与霸权主义国家和解，这与中国改善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也是一样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1978：373）。反而，中美关系缓和给中国有利的同时，也明显削弱了中国作为革命国家的形象和正统性。因此，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地主义与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对立依然存在，反对想要将这种流动性固定化的做法。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对外战略与周恩来等实务派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都是从对苏战略和经济重建的角度出发接近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但他们在基本的世界认识和手段上存在隔阂。

毛泽东对革命的野心，且不论是否反映了实际的国际政治，它是影响国内政治情况的重大问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内处于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之下，对于其他领导人来说，按照毛泽东的言论办事意味着获得内政上的主导权。

如果从这种观点来看，当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抱有很大的不满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1973年以后美苏紧张缓和取得了显著进展，而周恩来表示了欢迎。1972年5月至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相互进行了访问，在此基础上，美苏签订了一系列有关裁军的条约，美苏关系缓和取得了进展。而这种情况动摇了毛泽东利用美苏矛盾的“一条线”战略。此外，在国内，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上，对于上述美苏首脑会谈，总结为“美苏主宰国际政治的气氛更浓”，这在毛泽东的眼里，是迎合压制人民革命斗争的霸权主义势力的“右倾投降主义”（高，2003:451-458）。后来，周恩来因批准了这样的总结，被迫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356-357）。接着，1973年11月，周恩来未经毛泽东同意就积极响应基辛格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的提议，使得毛泽东愈发不信任周恩来。之后，连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批判周恩来（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1670-1671）。

毛泽东对美国及周恩来的这种不信任，波及到了以下3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毛泽东从这时候开始与“一条线”战略一并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所谓“三个世界理论”是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即：美苏霸权主义国家为第一世界；经济发达的欧洲和日本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其中认为，第三世界的人民应该也考虑与第二世界合作，以对抗第一世界的霸权主义。这种理论是出于毛泽东对美国的不信任而逐渐形成的，在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来以后，作为中国的对外认识逐渐形成体系（Yang and Xia, 2010: 410-418）。它同时也是中美和解后毛泽东摸索新的革命路线的结果。在此，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看待美国。美国在“一条线”战略中被作为合作的对象，相反，在“三个世界理论”中又和苏联一样被视为对抗的对手。两者对美国相反的定位，使得与西方国家的接近成为一个微妙的问题。

第二，毛泽东起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负责外交。邓小平在文革中被解除职务，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973年3月决定恢复他的职务，出任负责外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的动机有以下2点：其一，牵制已在国内外获得权威的周恩来（高，2003:501-509）；其二，邓小平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外交方面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益尾，2010:56-57）。邓小平在恢复职务后，从事把“三个世界理论”体系化的工作，并在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向全世界阐述了这一理论（Vogel, 2011:83-84）。邓小平和周恩来拥有一致的基本政策方针，但是周恩来权力被下放仍然导致国内的混乱。

第三，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将它发展成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本来通过对外主张“反帝反修”，对内推进与文革有关的政治斗争和三线建设，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因此他们对于实务派上台后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和抑制三线建设项目，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政策将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基础。在1973年8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全部当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扩大了在党内的影响力之后，四人帮把批判周恩来发展为批林批孔运动，其中，打着“自力更生”的口号，批判过度依赖外国，批判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

## 2. 批林批孔运动和对外开放政策

这样，四三方案所代表的对外开放政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成为四人帮批判和阻碍的目标。但是，这个运动，如下文所述，最终违背了毛泽东的初衷。针对对外开放的批判是从“蜗牛事件”开始的。1972年2月，美国的玻璃公司给中国彩电考察团赠送了一些玻璃蜗牛礼品，江青在第四机械工业部对此事，包括引进技术在内，进行了批判。之后，国务院业务组和对外贸易部为了弥补大型船舶的缺乏，探讨购买外国船舶。对此，1974年6月，王洪文针在书信中批判此事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是修正主义路线”（武，2009：585）。另外，从同年10月开始，由于上海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轮“风庆”号远航地中海成功，江青批判不使用国产船舶是“崇洋媚外”，想要进行路线教育（风庆轮事件）（马，1998：384）。

对于这些批判，实务派政治领导人反驳称，扩大贸易与自力更生并不矛盾。例如，李先念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为前提的同时，应该有计划有选择性地引进物资和新技术”。李强也说：“我们引进成套生产设备和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加强自力更生”（《李先念传》编写组编，2011：256-257；资料5）。尽管如此，很难认为，这些反驳能够制止这些运动。

当然，在开展这次批林批孔运动的过程中，重要的一点是，带来了政治经济的停滞，其中包括四三方案被迫延迟。批林批孔运动在地方也引起了严重的政治混乱，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四川、湖南、湖北、广东等运动尤其激烈的地区，满街出现了大字报，再次发生抢夺武器和行政资料、批斗干部等文革初期见到的现象（祝，2007：391）。这种政治混乱也波及到了经济情况，同年1月至5月间，煤炭产量下降6.2%、钢铁产量下降9.4%、铁路货运量减少2.5%、化肥产量减少3.7%，财政收入也减少了5亿元，支出增加了25亿元（《李先念传》编写组编，2009：809-810）。而且，四三方案的一部分计划也被迫延期（陈，2005：58-59）。

毛泽东听到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后，逐渐对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表示警惕，开始采取行动，结束这场政治运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372-373，394-399）。如上所述，这是因为，对毛泽东来说，国内经济建设是对外战略的一环。毛泽东于1974年8月多次表示“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还在11月作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402，410）。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逐渐得到控制。

如此看来，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由于周恩来为首的实务派和四人帮之间争夺政治权力而引发的政治混乱，但是本质上可以理解为，在美苏关系缓和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依据革命路线而采取的对外战略和对外开放之间潜在的矛盾日益尖锐而引起来的。毛泽东为了牵制国内有右倾投降主义倾向的周恩来，放任四人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是这种运动导致了损害作为毛泽东对外战略一环的国内经济建设的经济停滞。这一时期，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决定接班人的重要关头，因此，他对四人帮的工作能力越来越失望（高，2003；Vogel. 2011：114-115），而作为坚持对外革命斗争，同时贯彻“一条线”战略，并具有进行国内经济建设能力的接班人，开始重视邓小平。

### 3. 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

上述国内政治情况，是如何反映在围绕对外开放的讨论中的呢？从1974年1月开始，国家

计委在余秋里的主导下，启动了第五个五年计划的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他们对于容易遭到批判的对外经济交流，降低了论调，而是开始强调旨在实现全面工业化的“四个现代化”。在同年7月关于长期计划的座谈会上，余秋里提出了沿袭第四个五年计划修正草案的工业化战略。他的讲话中说明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通过发展农业、轻工业，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样的逻辑，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关于对外贸易，他指出了危险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恢复从1965年以后的官方文件中消失的“四个现代化”（资料7）。我想，此时提出四个现代化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通过提出整体的现代化方针，响应毛泽东的经济建设的号召；另一方面，作为这种现代化的支柱，想要维持扩大对外贸易的方针。即，可以理解为，一直以来被理解为周恩来的经济建设的象征的“四个现代化”，在政权内部的逻辑中，实务派企图通过强调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避免遭到四人帮的批判，同时在工业化战略中推进对外开放政策，可以说，是作为“调整过的口号”而提出来的。

这样，四个现代化在1975年1月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了出来。这份报告不仅明确说明了现代化的方针，而且反映了上述的讨论意见。例如，关于经济计划，称是根据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优先顺序而制定的，另外，关于对外贸易，则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提出也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这份报告重视经济建设，也是毛泽东在大会前召开的第十届二中全会上指示，要在可以避免世界大战的几年中奠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一指示得到反映的结果（中央文献室编，2004:15）。而且，在这次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作出了人事调整，多名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晋升为副总理（资料2）。其象征就是邓小平晋升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从1975年开始，邓小平取代卧病在床的周恩来，继承了这个现代化方针，同时坚决实行“整顿”政策（益尾，2010；Vogel，2011）。虽然邓小平激进的“整顿”政策被毛泽东认为是修正主义，但四个现代化后来被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所继承。

另外，四三方案后来成为邓小平等人推进改革开放政策时候的资产。四三方案中引进的成套设备，虽然被延迟，到1983年为止全部完成（陈，2005：21-23）。根据这一时期作为轻工业部的负责人而参与四三方案的陈锦华的观点，四三方案对中央和地方的人才培养、积累对外业务单位的经验、吸收企业管理的技术和知识等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软件方面，也对后来发展改革开放路线作出了贡献（陈，2005:39）。

## 五、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70年代前期围绕四三方案的一系列政治历程，阐明了文革后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具体情况。

四三方案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根据1972年前后的国际环境变化，把对外战略和本国发展战略合理结合的政策。中国领导层在1970年左右设想了来自全方位（尤其是苏联）的军事入侵。然而，随着中美和解、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等对外环境的变化，除了一直以来的“战争准备”以外，中国开始谋求通过“一条线”战略，与西方国家合作等外交努力，来对抗苏联的

威胁。这样，在对苏战略多元化的形势下，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当前可以避免与苏联进行全面战争，为了在此期间，重建因文革而疲软的国民经济，中国谋求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促进工业发展。

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对外环境的变化和四三方案的实施，同时对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也产生了影响。以往，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为了“备战”而推动三线建设，实行侧重内陆地区和国防工业、重工业的经济政策。1970年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反映了这一方针。然而，随着上述变化，以往的“备战”方法也被迫改变。而规定这种改变方向的，是四三方案等扩大贸易的方针。由于这个方针，使得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大规模沿海地区的港口建设以及成套设备建设变得更加重要，因而导致了整体工业化战略的转变。结果，以周恩来等实务派为核心，1973年中期对第四个五年计划进行了修改，把建设投资转向农业、轻工业和沿海地区。进而，为了实现这种工业化战略的转变，他们将文革时军队掌握的经济建设权限和下放到地方的各种权限集中到了国务院，同时，为了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他们从实务方面改变了有关资金筹措制度的禁忌。从这样的实务派主导的工业化战略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外开放政策的迹象。

然而，这种对外开放政策，在国内政治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这是因为，在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与对外开放政策之间发生了潜在的矛盾。一方面，毛泽东从经济建设的观点出发，批准上述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想要与以往的文革政治路线（备战、自力更生）进行整合，追求新的革命外交路线。构成这种革命外交路线的政治要求是：虽然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但不能迎合美国的霸权主义；虽然引进技术，但不能损害自力更生。而这种明确的区分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政治是以毛泽东的政治要求为前提的，它不得不变成对外开放和革命外交路线共存，同时又包含矛盾的产物。而且，如何整合两者制定政策，对于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而言，是在国内主导政治的运作所不可避免的课题。

这种矛盾的格局，由于美苏关系缓和取得进展，变得更加尖锐，导致了国内的政治混乱。在这个意义上，周恩来因对美国采取合作态度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丧失了国内的权威，对外贸易遭到了四人帮的批判，这些都是没有能够响应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要求的周恩来的局限，说明了这个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脆弱性。有一点在本文中并没有详细提到，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恢复职务后，一方面把三个世界理论体系化，另一方面大大改变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政策，也许这可以理解为，邓小平对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扬弃的一种尝试。而且，按照同样的观点，一边降低对外贸易的论调，一边强调经济建设的四个现代化，可以说是实务派官员们在政治冒险中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对策，也可以说是一个经过调整的口号。这样，毛泽东在世时的对外开放，由于被调整，使其与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相符合，因此，它作为经济政策（工业化战略）形成了基本路线，而作为政治路线只会是半途而废。

文革时期的中国随着国际秩序的变化，在政府内部制定了新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工业化战略，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不能脱离革命外交路线、备战以及自力更生这些原则。因此，尽管对外环境发生了客观变化，中国的对外开放仍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虽说如此，我们也应该留意到，随着对外环境发生变化，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的意义也逐渐变质。这是因为

，虽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正是由于在毛泽东的批准下推进对外开放的工业化战略，因而逐渐完善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政府机构为中心，积累了经验，支持基础得到了不断扩大，也是事实。另外，也正因此，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等人逮捕了四人帮不久，便能够迅速推进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系化的对外开放路线。

## 参考文献

日语

国分良成（2004）、『現代中国政治と官僚制』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

呉曉林（2002）、『毛沢東時代の工業化戦略：三線建設の政治経済学』御茶の水書房

益男知佐子（2010）、『中国政治外交の転換点——改革開放と「独立自主の対外政策」』  
東京大学出版会

丸川知雄（1993）、「中国の『三線建設』（Ⅱ）」『アジア経済』第4巻第3号、76-88

英語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Schoenhals, Michael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2011), *The Politics of China 3<sup>rd</sup> edition: Sixt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ughton, Barry (1988), "The Third Front: Defens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115, pp. 351-386.

—(1994), "The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47-69.

Reardon, Lawrence. C. (1998), "Learning How to Open the Door: A Reassessment of  
China's "Opening"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155, pp. 479-511.

Teiwes, Frederick C. and Sun, Warren (2007), *End of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New York: M. E. Sharpe.

Vogel, Ezra F. (2011),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Yang, Kuisong and Xia, Yafeng (2010), "Vacillating between Revolution and Détente:  
Mao's Changing Psyche and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Diplomatic  
History*, 34(2), pp. 395-423.

美国原始资料（正文中简写）

NSA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Nixon's Trip to China, Document, Memocon, Kissinger  
and Zhou, 2/22/72.

中文

- 陈东林（2003），《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陈锦华（2005），《国事亿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大事编要》北京：红旗出版社
- 高文谦（2003），《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
- 顾龙生编（1992），《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谷牧（2009），《谷牧加快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1987），《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2005），《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1978），《中共机密文件汇编》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 雷厉（2006），《历史风云中余秋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2009），《李先念传（1949-1992）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李先念传》编写组编（2011），《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李先念传》编写组等编（2011），《李先念年谱（第5卷 1970-1978）》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马泉山（1998），《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 史云、李丹慧（2008），《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武力编（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上卷）》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 叶笃初编（2009），《党的建设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编（198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1984年版》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04a），《关于“四三方案”的一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90辑，4-22页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04b），《关于“六五方案”的一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92辑，4-37页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2卷（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201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注释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9），《李先念文选（1935-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4）《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0），《陈云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3），《毛泽东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祝庭勋（2007），《李德生在动乱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紫西（2004），《李强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宋永毅编（2002），《文革期间毛泽东及中央领导讲话（补编）》

## 参考资料

香港中文大学

资料1：《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的谈话（节录）》，1973年6月22日

资料2：《周恩来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1975年2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档案资料

资料3：《余秋里同志在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B104-3-490-10）（上海市档案馆）

资料4：《李强同志在全国外贸计划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要点）》（324-2-125-072-076）  
（广东省档案馆）

资料5：《全国计划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296-A2.1-10-251）（广东省档案馆）

资料6：《中共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几个问题的请求报告（送审稿）》（B250-2-568-10）（上海市档案馆）

资料7：《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关于余秋里同志关于制定十年规划的讲话》  
（B-246-2-1004-1）（上海市档案馆）

# 中国共产党与宗教团体

## ——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基督教爱国团体改革的讨论为中心

上野 正弥

(庆应义塾大学)

### 一、问题意识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信仰某一种宗教的人急剧增多。其原因大致如下，一个是在此之前作为国民统合的凝聚力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急剧衰退；市场经济改革迅速展开，并由此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由此开始接触宗教信仰。其中，基督教新教（以下称基督教<sup>1</sup>）的信徒数量的增加格外让人瞩目。公开发表的数据显示，其数量由1982年的约300万人<sup>2</sup>增加到了2010年的230万人<sup>3</sup>，在不到30年的时间了增加了近八倍。而且这还只是政府方面所掌握的信徒的数量，如果加上那些未登记的教会的成员，人数会更多<sup>4</sup>。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共产党”或“党”）通过推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并以此来维护社会稳定和一党统治体制。在这种状况下，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追求物质需要之外的精神上的满足并由此进入宗教信仰，这些人所建立并逐步扩大的关系网所依据的是个人内心的价值和信仰，而这是共产党的领导所无法控制的部分，这对共产党来说，绝非只是一桩可以避而不见的小事。面对国内的宗教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统治面临怎样的问题呢。本文将对此进行讨论。具体来说，在宗教这个领域，

---

<sup>1</sup>在汉语中，“Catholic”和“Protestant”分别称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本文为了避免麻烦，在无须特殊区分的文字中，统一使用“基督教”。

<sup>2</sup>《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央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十六页。

<sup>3</sup>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二〇一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一二八—一二九页。

<sup>4</sup>包括未登记教会信徒在内的基督教信徒数量，每个研究者估算的数值不尽相同，其差异幅度在六千万人到一亿三千万人。Tony Lambert,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Oxford: Monarch Books,2006),pp.18-19.David Ailman,*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Washington,DC:Regnery,2006),pp.6-8.李凡《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http://www.world-china.org/>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五日阅览)

起着连接党·政府与教会的桥梁作用的中间团体处在一种怎样的困境之中呢，本文将以此基督教为例，对此进行考察。

在中国，党·政府是通过两种方法将有宗教信仰的人统一到国家之中、并进行管理的。第一方法是统一战线制度。在对有宗教信仰人群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时，共产党一直以来所重视的是一些处在党·政府和有宗教信仰人群之间的、中间团体的作用。具体手法如下，即对于那些与体制合作、同时又得到了宗教信仰人群一定的支持和尊崇的宗教界领袖，党和政府将授予他们如政协委员一类的政治职务，同时组织一些爱国宗教团体，这些宗教领袖人物将被允许在这些爱国宗教团体中开展宗教活动。第二种手法是通过公安部门的强制力量推行严格的管理。对那些经过党和政府公开认可的爱国宗教团体之外的宗教活动，党和政府不予承认，并将其作为公安部门严格管理的对象。

对于建立在爱国宗教团体基础之上的基督教信徒管理制度，此前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研究的焦点之一，就是基督教爱国宗教团体的三自组织（详情见后述）的性质和功能。Alan Hunter and Kim-Kwong Chan 的研究中，对基督教信徒管理制度的全貌进行了描述，并指出三自组织完全是按照党和政府的命令来行动的代理机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宗教活动的严格管理已经有所减弱，此时的三自组织与文革时期的三自组织不同，开始不得不倾听处于组织末端的教会和信徒的意见和利益。按照该说法，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三自组织的实际状况做一个动态的描述，是非常困难的<sup>5</sup>。与此相对，邢福增从政教关系的角度对三自组织进行了分析，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自组织开始同时具备了政治功能（把信徒组织到爱国宗教团体并使其停留在体制中的功能）和宗教功能（代表宗教界的利益为信徒服务的功能），而党和政府与三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一致与冲突并存的矛盾关系”。然而，对于三自组织为何无法充分发挥其宗教功能，邢的研究并没有做深入的探讨<sup>6</sup>。因此，本文将对20世纪80年代三自组织内部所发生的有关组织改革的讨论进行考察，分析这场组织改革并未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三自组织为何无法充分发挥其代表教会和信徒利益的宗教功能的原因。党和政府对宗教的认识以及公安部门的行动也将是本文考察的焦点之一，本文将藉此描绘出共产党统治下的宗教领域的协调主义体制的特征，而这也是先行研究中所没有充分探讨的。

具体来说，论证过程将通过以下顺序进行。第二章主要是围绕有关基督教的统一战线制度，介绍其概要和形成过程。第三章对20世纪80年代由三自组织的领导们所提出的组织改革方案的动向进行考察。在对这场改革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共产党赋予三自组织的两种功能——即代表信徒利益的功能和辅助党和政府对体制外信徒数量的增加进行抑制的功能——的矛盾对立。这场改革并没有顺利进行下去、以致其无法发挥第一种功能。对于其原因，本文将聚焦于当时的政治动向、三自组织内部的意见对立、教会的统治结构所具有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

---

<sup>5</sup>Alan Hunter and Kim-Kwong Chan,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6</sup>邢福增《当代中国政教关系》（香港：建道神学院，二〇〇五年第二版）。

本章内容结束之前，对基督教爱国宗教团体的称呼做一些说明。目前中国的基督教爱国宗教团体，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4年设立）和中国基督教协会（1980年设立）两种，从中央到县级各层机构都有。前者是为统一战线工作这一政治任务服务而设立的，后者则是基督教的教务组织。但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二者领导层的人事是重复的，两个组织基本上是合为一体开展活动。在本文中，对这两种组织统称作“三自组织”，在需要对二者进行区分的语境中则分别称呼为“三自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三自”是指“自治”（独立于国外的教会）、“自养”（经济独立）、“自传”（传道是自立自主的）这三点。

## 二、对基督教的统一战线制度

统一战线的定义如下，“为了孤立及摧毁那些对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而言的主要敌人、团结自己的朋友、并在更广的范围内拉拢中间势力而采取的一种战略和战术”<sup>7</sup>。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各民主党派、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看作是“友人”，通过统一战线制度将他们留在体制里。在该制度下，对党和“友人”起到中介作用的人物和团体非常重要，而三自组织正是这样的一个团体，接下来本文将对三自组织的来历进行说明，并通过这个过程，对三自组织和对三自组织进行指导监督的统战部、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宗教局）三者的关系进行考察。

### （一）三自委员会的来历

把基督教带到中国来的，主要是那些于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前半的时期里来到中国的英国及美国的传教士。由于基督教主张万人祭司主义和圣经中心主义，而每个人对圣经的阐释是不同的，因此基督教有一种极易产生多种教派的倾向。于是，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把各自国内那种教派林立的情况也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中国。即，长老派教会、浸礼教会、卫理公会等，分别有着各自不同教派背景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传教，并在各地建立了各教派的教会组织。

在当时欧美各国的教会中，在神学领域，也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即自由主义神学（现代派）和福音派（基要派）的对立。两者围绕在中国传教的方法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现代派基于“在人间建立天国”的思想，把贫困问题的解决看作是传教的主要任务，因此他们主张，布道应该在提供医疗和学校教育等社会福祉的过程中进行。而基要派则认为对每个人的救济超过了伦理和社会哲学，并激烈地批评现代派提供社会服务的举措并非真正的福音传道。两个学派的对立，渐渐发展为组织的对立，现代派在中国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促进协会，基要派则成立了中华圣经联合会。姚西伊曾根据当时基要派的报告书对两派的势力对比进行了研究，根据姚的说法，基要派所成立的中华圣经联合会在1921年大约有1700名传道士，约占当时所有的在华传教士的20%。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现代派的传教士约有3000人。这个数据是基要派一方的推测，至少可以说明，对现代派有更多的传教士在中国这一点，他们是认识到了的<sup>8</sup>。对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的问题密切关注的现代派，在二十世

<sup>7</sup>天儿慧他编《岩波现代中国事典》（岩波书店，一九九九年），九二七-九二八页。

<sup>8</sup>姚西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基要派-自由派之争与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王晓明、杨熙楠主编《信

纪初充满了混乱和迷茫的中国的社会环境中，积极开展了各项活动。现代派的传教士和中国的信徒们，在城市开展了学校教育、在农村进行了乡村建设等各项活动<sup>9</sup>。现代派的思想，与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所主张的救国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思想是较容易产生连接的。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现代派的一部分信徒和团体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关系。其中的一个人，就是后来成为三自委员会主席的吴耀宗。吴耀宗与共产党员的接触，始于1930年代初他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全国协会从事出版工作之时<sup>10</sup>。1938年他在武汉与周恩来会面，之后又在重庆有了第二次会面<sup>11</sup>。吴耀宗之所以与共产党接触、并对其提供支持，这背后是他自身的爱国主义思想。国际友和会是一个提倡基督教的和平主义、非战主义的组织，吴耀宗当时隶属于国际友和会的中国支部唯爱社，发表了诸多有关反对使用武力战争的言论。但是，随着日本侵华的逐步深入，他逐渐放弃了和平主义，开始强调救国抗日的思想，投身于一些救国运动团体<sup>12</sup>。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会作为各个抗日组织的联合团体成立了，吴耀宗从该会的设立之初就参与了这个过程<sup>13</sup>。

日本从1936年1月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大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从事救国运动的学生和社会活动家进行了严厉镇压。与此相对，共产党则以统一战线的思想为基础，与从事救国运动的各团体中的精英人物进行接触，强化了与他们的关系。这样一来，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督教徒吴耀宗与共产党的相遇所需要的环境，就形成了<sup>14</sup>。不久之后，吴耀宗所属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以及各地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开始在组织的层面与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联系。国共内战时期，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曾经给从事地下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提供聚会场所等等，从多方面进行支持。共产党员们以这些场所为根据地，逐渐把活动据点扩展到了上海市内的各所大学<sup>15</sup>。

这样一来，对于不仅思想上与党是亲和的、组织上也与党有了密切关系的现代派、尤其是青年会属下的教会势力（青年会派），共产党逐渐把他们提升到了爱国宗教团体的领导层这

---

仰与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二九四页-二九五页。

<sup>9</sup>姚西伊，同前书，二八八-三一二页。

<sup>10</sup>梁家麟《吴耀宗三论》（香港：建道神学院，一九九六年），十五页。

<sup>11</sup>吴耀宗《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 艰苦朴素 平易近人—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八十一周年》《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

<sup>12</sup>沈德溶《吴耀宗小传》（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一九八九年），十二-四〇页。

<sup>13</sup>Christina Wai-yin Wong, "Expanding Social Networks: A Case Study of Cora Deng and Y.T.Wu on Their Role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in 1930s China," 邢福增主编《大时代的宗教信仰—吴耀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二〇一一年），二九一-三四〇页。

<sup>14</sup>Ibid.

<sup>15</sup>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

样一个位置。首先，党把吴耀宗等几位有青年会北京的基督教徒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并使其参加了1949年9月举行的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为基督教界的代表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吴耀宗、刘两模、邓裕志、张雪岩、赵紫宸共五人，前面四人均所属于青年会或者女子青年会<sup>16</sup>。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会见了基督教华北访问团。该访问团由吴耀宗、刘良模等七人组成，其中四人来自青年会派<sup>17</sup>。该访问团的任务，原本是把各访问地区的教会所提出的需求和愿望传达给政府，因此他们带了一份意见书，该意见书是围绕当时的临时宪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写成的。但是，以这次会见为契机，该访问团开始不由自主地背负起了一个功能，即把党的政策向下传达给信徒。在这次会见上，周恩来对教会提出了一个强烈的要求，即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当时，美国支持的是蒋介石一方，这种状况下，共产党对派驻国内的美国传教士时时持有怀疑的眼光<sup>18</sup>。对于该访问团所提出的意见书，周恩来发出指示，要求改写为告发帝国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的文章。于是，吴耀宗等人把该意见书改写为了题为《中国基督教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的文章<sup>19</sup>。后来，该文章在经过几次修改后，于该年7月28日作为题为《新中国建设过程中中国基督教应该努力的方向》的文章，在40人署名后向基督教的信徒们发表。纵观这四十位签名者的所属单位，青年会派有10人，占比例最高<sup>20</sup>。虽说是吴耀宗等人推动了《革新宣言》的署名活动，并主导了中国基督教的革新运动，但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支持下进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意识到了通过基督教的信徒代表推动教会进行反帝国主义运动这种方法的好处，特别是毛泽东，曾发出指示说，把吴耀宗起草的文章传达给各地的党委，并把基督教信徒代表的意见刊登在《人民日报》上<sup>21</sup>。《革新宣言》以及对该宣言表示支持的社论，一同刊登在9月23日《人民日报》的第一版<sup>22</sup>。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到1954年为止，署名者的人数达到了41万8389人<sup>23</sup>。

<sup>16</sup>梁家麟，同前书，三-四页。

<sup>17</sup>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运动与基督教史论》（香港：道风书社，二〇一二年增订版），二十九-三十三页。

<sup>18</sup>青山瑠妙《现代中国的外交》（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一二〇页。

<sup>19</sup>沈德溶，同前书，五十五-五十六页。

<sup>20</sup>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运动与基督教史论》，三十六-四十一页。

<sup>21</sup>周恩来《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一九五〇年五月）》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八-一八七页。毛泽东《对吴耀宗的中国基督教会三自宣言的批语（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九七页。毛泽东《关于广播吴耀宗文章给胡乔木的信（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同前书，五八一页。

<sup>22</sup>《人民日报》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sup>23</sup>吴耀宗《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罗冠宗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一九五〇-一九九二》（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一

以青年会派为核心的国内基督教信徒的组织化，通过告发运动这样一种大众动员的方式而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1951年4月16日，由新开设的政务院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后述）召开了“对一部分从美国领取援助的基督教团体的处理会议”。在该会议上，主要通过了一下两点决议。第一，成立了三自委员会设立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吴耀宗为主席，由包含他在内的二十五名委员构成。二十五名委员中，有十二名是有青年会背景的，委员会下面所设的联络组、宣传组、总务组的组长及副组长，全部是由青年会派担任<sup>24</sup>。第二，动员教会领袖参加告发大会，批判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根据该会议决议，在会议进行期间近进行了两次召开了为其两天的告发大会，包括三自委员会成立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内的参会人员，把那些美国传教士以及受他们所影响的中国传教士当作美国间谍，进行了批斗。由教会领导对教会内部的人进行批判这种大众动员模式，此后传遍了全国，各地都召开了告发大会。在这些告发大会上，基要派的教会被当作批斗的目标。在会上，对基要派的批判，集中在他们的信仰活动的重点仅仅放在个人的慈善救济方面而超然于政治之外这一点上<sup>25</sup>。另外，基要派的一个组织，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的领袖，被认为协助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拒绝了在《革新宣言》上签字，而受到了该组织的普通信徒的批判<sup>26</sup>。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期全国会议上，三自委员会成立了。对基要派各主要教会的领袖进行逮捕，成为革新运动的新的工作重点。1955年8月，一直拒绝在《革新宣言》上签字、并在其自己发行的杂志上批判三自委员会干部们为“不信派”的王明道，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sup>27</sup>。1956年1月，倪柝声（在欧美以 Watchman Nee 的名字为众所周知）也同样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被逮捕。倪柝声所率领一个教会团体基督教聚会处，虽然曾在《革新宣言》上签字了，但出于反对教派主义的立场，对于加入一个全国性的教会组织是持消极态度的。对这两个人的逮捕，三自委员会都表达了全面的支持，并在上海举办了批判王明道和倪柝声的大会<sup>28</sup>。

综上所述，共产党在构建对基督教的统一战线组织时，从基督教的诸多教派中选择那些可信赖的势力，赋予他们率领爱国宗教团体、团结基督教界人士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被共产党判断为可能会反对自己的方针政策的势力，所采用的方法是或者使其开展彻底的自我批判，或者是直接逮捕其领袖人物。

## （二）共产党对三自委员会的领导

如上所述，对于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个人，共产党赋予其组织大众团体的权利，试图以此来使其所属的团体全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而共产党统战部的领导，则更加强了这一制

---

九九三年），四十三页。

<sup>24</sup> 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运动与基督教史论》，七〇—七十一页。

<sup>25</sup>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四日。

<sup>26</sup> 《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九月六日。

<sup>27</sup> 邓肇明《沧桑与窘境—四十多年来的三自爱国运动》（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四十二—四十七页。

<sup>28</sup> 邓肇明，同前书，三十八—四十七页。

度。统战部是承担所有统一战线工作的党政机关，具体到宗教工作，则是政府所属的宗教事务局（宗教局）在统战部的领导下推行各项政策。宗教局也是一样，在北京的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各级政府都设有下属组织。现在的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前身是宗教事务处，中央政府下设宗教事务处的成立，最早是在1951年7月，其后在全国各大行政区都设立了下属机构。最初，宗教事务处是设在政务处文化教育委员会之下的组织，1954年11月升格为国务院<sup>29</sup>直属机构，并改名为宗教事务局<sup>30</sup>。

中央和地方的三自组织，在以上两个党和政府机关的指导、监督下开展活动。各级三自组织的领导层的人事的选拔过程是不公开的，但据说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统战部和宗教局的意见<sup>31</sup>。特别是在地方的三自组织中，这一倾向更加明显<sup>32</sup>。而且，三自组织的会议上，必定有统战部或者宗教局的干部出席并讲话。

除了统战部和宗教局这样的统一战线组织之外，在宗教政策中，公安部也起到了重要并且具有实质性的作用。公安部的作用主要是对那些被共产党和政府定为“邪教”或者反动会道门的信仰团体进行管制，对基督教来说，公安部还对他们与海外基督教团体的联络状况进行监督，对于大规模的家庭教会进行严格管理、逮捕这些组织的领袖人物，而这些都是在与宗教局的联合下进行的。公安部的存在，给统战部和宗教局的指导和监督赋予了物理层面的强制性力量。

### 三、20世纪80年代的宗教改革与三自组织制度的改革方案的提出

上述提到的统一战线制度，三自组织制度，在文革中几乎无法发挥作用，对基督教的镇压四处横行，三自委员会也停止了活动。但是，文革结束后，1979年2月，党中央统战部下达了《有关在全国各地的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去除“实行投降主义路线”标签的通知》之后，统战部门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宗教政策也得以重新实施<sup>33</sup>。此后，文革时期只能在地下隐蔽开展的宗教活动也慢慢地出现在公开的场合。同时，基督教复苏的过程，也是统一在三自委员会下的多个教派逐渐复苏的过程。在这样的状况下，共产党是如何应对的呢。本文接下来将对这一点进行论述。

（一）文革结束之后的宗教政策，基本上是在建国初期形成的上述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82年3月，党中央发布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以《十九号文件》的名字为大家熟知，以下简称《十九号文件》），表明了此后的宗教政策所的全面方针和所面临的问题。在宗教问题方面，文革后的共产党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要恢复在文革中由于对宗教团体的压制而失去的对党的信任问题。因此，在《十九号文件》的开始，承认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宗教将会长时间存在，并承认了1957年以后宗教政策方面

---

<sup>29</sup>政务院于一九五四年改为国务院。

<sup>30</sup>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六二-三六七页。

<sup>31</sup>Alan Hunter and Kim-kwong Chan, *op.cit.*, p.59.

<sup>32</sup>许圣义《“两会”换届应依法选举》《天风》一九九六年第十二期，二十三-二十四页。

<sup>33</sup>《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同前书，一-四页。



的左倾错误。

另外，在《十九号文件》中，有关宗教界的统一战线制度的部分，也提出了宗教要跟建国初期一样重视宗教界领袖和爱国宗教团体的地位。实际上，在统一战线工作重新恢复之后，马上就开始了把宗教界领袖笼络到体制中去的工作。1979年2月，党中央统战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对宗教界领袖政策的意见》，提出了让僧侣和牧师等专业宗教人员恢复寺院或者教会的工作的方针<sup>34</sup>。同时，由于反对革新运动而被逮捕的王明道等教会领袖也得到了释放<sup>35</sup>。对于爱国宗教团体，1980年1月，党中央批准了统战部提出的《有关召开各宗教团体的全国性会议的报告》，宗教团体活动得以重新开始<sup>36</sup>。1982年提出的《十九号文件》也沿用了该方针，指出“争取并团结教育”好那些宗教领袖是“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使爱国宗教团体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可以使党的宗教政策真正扎根下去，也是是宗教活动得以正常化的重要的组织保证”。

《十九号文件》另一个值得瞩目的地方，是把有关宗教活动的规定，明文确定了下来。指出宗教活动是在一定的场所进行的，而所有的活动场所都将在“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指导下决定”。此外，将这些活动场所，也即寺院、教会的土地及建筑归还于宗教团体，若建筑物被损坏了则应予赔偿，一这被当作当前最重要的课题<sup>37</sup>。

《十九号文件》宣告了宗教政策的复活，该文件的出台，被认为胡耀邦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胡耀邦曾经积极处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所面临的问题，这一点为人所熟知，与此相关，他在宗教问题上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刚刚就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1980年3月主持了西藏工作座谈会。在该次座谈会的纪要上他指出，从民族团结的角度出发，必须尊重大众的正常宗教活动。并就如何对待藏族的民族宗教、也即藏传佛教做了具体的叙述<sup>38</sup>。1980年7月当该纪要公开时，杨静仁（国家民族委员会主任、1982年起兼任党中央统战部部长）在《红旗》上发表了有关西藏工作的论文。文章中杨静仁指出，宗教是无法被人为的因素强制性地消灭的，应该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以此来解决宗教问题<sup>39</sup>。如上所属，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开始探讨如何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宗教问题的存在进行合理化。胡耀邦把这项事务交给了党中央书记处来处理。此外，胡耀邦的秘书郑必坚

---

<sup>34</sup>北京社会主义学院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〇一页-三〇二页。

<sup>35</sup>Thomas Harvey, *Acquainted with Grief: Wang Mingdao's Stand for the Persecuted Church in China* (Grand Rapids: Brazos press, 2002), pp. 118-119.

<sup>36</sup>北京社会主义学院编，同前书，三〇二页。

<sup>37</sup>《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同前书，五十三-七十三页。

<sup>38</sup>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三十三-四十七页。

<sup>39</sup>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同前书，六十三-七十八页。

作为主笔起草了《十九号文件》，并由党中央书记处进行了对外发布<sup>40</sup>。

如上所述，在胡耀邦的影响下，《十九号文件》终于出台，与文革时期相比，国内的宗教活动得到了大幅度的认可。但是，与20世纪50年代一样，这仅限于那些由得到了政府认可的组织所举行的、在被认可的地点所召开的活动。对于那些公认的宗教，他们的活动作为“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得到政府的保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在“在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之外的信仰活动，也即被当作反动会道门以及提倡异端邪说的信仰团体，则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对于五十年代曾经一扫而空的反动会道门的活动，在文革结束后又很快就重现江湖这一点，共产党表现了极大的警惕。从80年代中期公安部制作的某内部材料中可以看到，全国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案件，在1981年比去年增加了78.9%，1982年比去年增加了31.4%，年年都在增加<sup>41</sup>。

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着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和教义的信仰集团，共产党有着较强烈的警惕。一贯道是共产党最讨厌的反动会道门之一，共产党对于它们这些团体的组织构成（内部的派别、支部的组成、领袖的职务分担）和主要教义都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共产党之所以对这样的团体怀有警戒之心，一般认为是出于以下的担心。第一，信仰团体的影响力会一直影响到基层党组织。对于维持党的统治来说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基层党组织是否被信仰团体所占领，共产党对这一点是格外警惕。实际上，在河南省的林县，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情发生过，即一个叫做花斋道的团伙的领袖人物，把包括生产大队长在内的30名党员都发展成了自己的成员。第二，拥有许多成员的团体，横跨几个省或者县开展活动，共产党对于这样的事情也很警惕。80年代初期，河南省和安徽省的二省四县境内开展活动的圣贤教、在云南省内几个县开展活动的一贯道，都受到了严格的取缔。第三，信徒数量的急剧增加。文革结束后，宗教信仰的自由得到了保障，马上就有一些团体主张自己是佛教或者儒家的正规的团体、自己的存在是合法的，带着这样一种姿态来开展布教活动。共产党对此是有所察觉的。第四，国外信仰团体对国内信仰活动的侵入。在香港和东南亚已经获得了组织性的发展的一些宗教团体，开始在国内开展活动，这也是被格外警惕的。公安部门把这些事情看作是80年代之后的新动向。可以说，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公安部门对信仰团体的侵入开始持警戒之心<sup>42</sup>。

## （二）有关三自组织改革的各种动向

### 1. 改革方案的提出

共产党开始对体制外的信仰团体的增加感到威胁，因此，它对各个爱国宗教团体提出了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即把所有的信徒都召唤到团体当中来。1980年1月，三自组织的最高机关中国基督教第三次全国会议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召开，出席该会议的萧贤法（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长），就“团结”的问题进行了谈话。讲话中，他从邓小平在1979年所提出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任务、即团结那些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一方针出发，对三自组织提出了如下

<sup>40</sup>蓝希峰《亲历者谈十九号文件》《中国民族报》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sup>41</sup>公安部一局编《反动会道门简介》（北京：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六〇页。

<sup>42</sup>公安部一局编，同上书，七十八-八十一页。

要求<sup>43</sup>。也即，除去那些给国家带来极端恶劣影响的人之外，应当把所有的基督教信徒都吸引到三自组织以及其下属的教会中来。

为了达成这项任务，如《十九号文件》中所述，爱国宗教团体不仅要接受党和政府的指导，团体自身也必须要有能力解决宗教界的问题，并能代表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并获取信徒的信任。在这种政治目的下，三自委员会的主席丁光训提出了对三自组织进行改革。

丁光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的目的，是把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后已彻底变成国家行政机关的三自组织，依据《十九号文件》的规定，重新恢复它代表信徒权益的机构的面目。如前章所述，建国初期的三自组织在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下开展了一系列的革新运动，凡是不同意《革新宣言》的人都被迫在革新大会上进行自我批判。这样一来，基督教的世界中被带入了政治伦理，三自组织也变成了一个上意下达的机关来进行工作。因此，三自组织成为了一个“像教会又不是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的对教会工作进行指导的管理部门<sup>44</sup>”，难以得到信徒的信赖。此外丁训光认为，各地的三自组织与当地的宗教界一起介入了基层教会的人事和运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例如，丁光训在1984年对政府干部们指出了地方宗教局以及三自组织人员中所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一部分地方宗教局干部介入了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并专断地做出决定或者推行某项政策。而且，这些干部缺乏对宗教和信徒的理解。第二，有一些取缔宗教活动的法令，是以爱国宗教团体的名义发出的。例如，河南等地的省三自委员会出台了《基督教徒爱国守法公约》，该公约包含了对传道者的活动范围进行限制、禁止与现代派的教义相反的个人崇拜式的信仰形态等内容<sup>45</sup>。这样的状况，对于爱国宗教团体发挥把所有的信徒团结起来的作用是非常不利的。第三，各个层次的三自组织的官员的人选，是根据当地的宗教局干部的意思来指定的。宗教局干部往往会把一些听从自己指挥的牧师放到管理人员的位置上。也即，在三自组织的官员选拔上，信徒的意见没有被反映出来，而宗教界领袖也无法代表宗教界的利益<sup>46</sup>。如上所述，丁训光指出了政府干部和三自组织官员双方的问题，认为三自委员会并没有站在信徒的立场上、反而是站在一种对宗教局的行政活动进行辅助支持的立场上开展活动的，他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了解决以上提出的三自组织的问题，丁光训在三自组织的会议以及全国政协会议（以下简称全国政协）等场合，提出了重新看待爱国宗教团体与政府的关系的改革方案。在会议上，丁训光频频使用“教会化”“教会式”等词语，提出了三自组织以及其下属的教会应该有的样子。1987年8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两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联席会议<sup>47</sup>（以下简称成都会议）上，对三自组织的教会化，丁训光做了如下发言。

---

<sup>43</sup>《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萧贤法局长在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天风》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二十三-二十八页。

<sup>44</sup>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在全国两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金陵神学志》第十期，一九八九年，二页。

<sup>45</sup>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修订版），三二八-三二九页。何牧华《举手祷告、儆醒守望》《中国与教会》第二十一期，一九八二年，一-四页。

<sup>46</sup>如文《学习一个文件的心得——一篇发言》《宗教》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八-十五页。同一作者的《学习“十九号文件”心得》，为该文章的删减版本，收录在《丁光训文集》。丁光训《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八六-三九七页。

<sup>47</sup>此处所说“两会”为三自委员会与基督教协会。

三自组织确实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基督教组织，并非普通的政治组织。三自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组织，因此在做好政治工作的同时，应该充分尊重它这种特殊性。因此，三自组织必须要进行教会化的改革。教会化以后，三自组织将会团结更多的信徒

<sup>48</sup>。

丁光训这里提到的“教会化”中的“教会”指的并非是做礼拜的建筑物，而是信徒的集合体（ecclesia）。从成都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上述提到的1984年讲话可以看出，丁光训所说的三自组织的特殊性，意为三自组织与其他的大众团体是不同的，是由持共同信仰的人们组成的，共产党对三自组织的领导，不应该与对待其他人民团体的态度一样，应该通过改善统战部以及宗教局这些信徒集合体之外的力量对它的介入的状况，而恢复信徒对三自组织的信任。此外，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他指出，在三自组织内部也有固执于个人利益、试图把教会当作自己的领地的现象的存在<sup>49</sup>。1988年12月，在上海的田林宾馆召开的全国两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联席会议（以下简称田林会议）上，他指出，基督教协会和基层教会的关系“并非一种行政关系，而是教会式的、牧羊式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并非是凭借权力以一种监督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是出于某种神学上的或者原则上的指导和支持而体现出来的”<sup>50</sup>。在这里，他没有提三自组织和三自委员会，而是提到了基督教协会。之所以如此，是他试图加强于1980年作为基督教的教务组织而设立的基督教协会的作用，并以此作为推行三自组织的教会化的具体方案。文革结束后三自组织重新恢复活动时，丁光训强烈要求另外成立一个与三自委员会不同的组织，来负责圣经的出版、改译、神学校的运营。通过重新设立一个组织来承担教会本应该承担的教务工作，改善那些身处三自组织之外的信徒对三自派系的教会的印象，尽量把他们拉回到体制内来。因此，丁光训在设立基督教协会时明确指出，虽然三自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并非那种一方领导另一方的关系<sup>51</sup>。但实际上，由于人才缺乏等原因，中央和地方的基督教协会的人事安排，与同级别的三自委员会的人事几乎是重合的。对此，丁光训在1986年召开的中国基督教第四次全国会议上指出，没有基督教协会的三自委员会将游离于教会和信徒之外。他认为，应该使基督教协会顺利开展对信徒有益的教务工作<sup>52</sup>。

改革支持派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的政治环境的支持。关于大众团体的改革，从1980年10月所公布的《庚申改革案》开始有了诸多议论，在1987年11月召开的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赵紫阳总书记提出不仅要进行“党政分离”，也要实现政府与大众团体的关系的正常化，他的发言引发了更多的大众团体的改革的讨论<sup>53</sup>。此后1988年4月召开的第7次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提出，“政教分离”是当前宗教工作所面临的三个重要问题中的一个。具体来说，他指出了三个方面，

---

<sup>48</sup>丁光训《再谈办好教会》《桥—中国教会动态》，第七十四期，一九九五年，十二—十五页。

<sup>49</sup>同上。

<sup>50</sup>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在全国两会常委连席会议上的发言》《金陵神学志》第十期，一九八九年，四页。

<sup>51</sup>丁光训《回顾与展望—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开幕词》《天风》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四—十一页。

<sup>52</sup>丁光训《愿主坚立我们手所作的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中国基督教第四届全国会议专辑》（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一九八六年），五十二—五十八页。邢福增《当代中国政教关系》，八十二—八十六页。

<sup>53</sup>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九八七年十月二五—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十四—四十六页。

一个是应该把政府的宗教工作部门、宗教团体、寺院教会等的职能分离开来；第二是政府对宗教团体的领导和管理制度、管理方法需要修改；第三是对于宗教团体，一方面是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但同时也应该可独立自主地开展<sup>54</sup>。对此，在统战部照看的第二次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上，丁光训与汪维藩（金陵协和神学院教务长）一起表示了赞同之意<sup>55</sup>。此外，丁光训自己也在1989年3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应该提高教会相关人员在教会人事以及牧师任命方面的发言权等具体的改革方案<sup>56</sup>。这个时期，在爱国宗教团体的改革之外，对宗教和宗教活动进行了各项规定的宗教基本法也在起草之中，有关政治和宗教关系的讨论呈现出一种热潮<sup>57</sup>。

## 2. 对改革方案的抵抗

如上所述，围绕着基督教信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三自组织的人们，特别是文革之前就在地方上担任三自组织的官员的老委员们，并不支持丁光训等倡导改革的官员的意见。如前所述，成都会议和林田会议上围绕三自组织的改革各种意见互相碰撞的场景，已经介绍过。根据汪维藩的回忆，六四事件之后，一部分老委员把田林会议批判为“反对党的领导，推进资产阶级自由化，性质恶劣的一个会议”，可以想见，这些老委员对于丁光训的改革方案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sup>58</sup>。由于他们是三自组织的官员，被政府赋予了与各级人民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地位。从专业宗教人员中选出宗教界领袖，给予他们政协委员等的职位，这是统战工作常用的手法之一，这意味着，为了把宗教界人士笼络到体制内，而赋予某一部分的宗教人士以特殊的权益。因此，对于那些想要获得这些特殊权益的宗教人士来说，这样的改革意味着，在实质上把控着三自组织官员选拔权力的宗教局与自己的关系将要被重新看待，他们不欢迎这样的改革。另外，既存统一战线制度不仅仅涉及人事方面的权力，同时也带来了某种形式上的物质供应系统。1980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发布了《有关宗教事务费的通知》，规定对于生活困难的职业宗教人士，党和政府将予以支付生活费<sup>59</sup>。

那么，这些人何为对丁光训的改革方案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呢。这与当时的基督教界的统治结构上的问题有关，也即，来自三自组织中央的意见，很难渗透到地方的三自组织和基层教会中去。在自组织内部，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领导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基督教界的统一战线制度中，地方的三自组织和教会不仅仅要接受上级三自组织的领导，而且也要接受同级行政水平的党委员会统战部、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宗教局）的领

---

<sup>54</sup> 《赵朴初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赵朴初文集（下卷）》（北京：华文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八八一-八八五页。

<sup>55</sup> 汪维藩《廿载沧茫—汪维藩文集（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八）》（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二〇一一年），二三〇-二四七页。

<sup>56</sup> 丁光训《对我国宗教工作的几点意见—丁光训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书面）》《天风》一九八九年第五期，增页一-二。

<sup>57</sup> 《国务院宗教法起草小组的报告》《中国与教会》第六十六期，一九八八年，十五-十六页。汪维藩《从现代法学观念谈宗教立法》《金陵神学志》第十期，一九八九年，八-十五页。

<sup>58</sup> 汪维藩，同前书，六二二-六二六页。

<sup>59</sup>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宗教事务费的通知（节录）》邓肇明，同前书，二四一-二四四页。

导。因此，地方的三自组织和教会，一方面接受着来自三自组织的纵向的领导，同时也接受着来自同级别的党政机关的横向的领导。

对这两种领导监督系统进行一下比较会发现，横向的领导比纵向的领导还要强有力。第二章曾提到过，政府的宗教事务处从 1951 年开始在全国各大行政机关设立起来，1954 年 11 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成立。宗教事务局的业务主管范围和领导系统也逐渐被确定下来。到 1953 年末，政务院宗教事务处主要管辖天主教和基督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则由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管辖。但是，到了 1957 年 3 月，党中央决定，有关上述五大宗教的工作在党内由各级统战部、在政府内则由各级宗教事务部门来分别进行统一管理<sup>60</sup>。另一方面，三自组织的领导系统的建立，各地的进展是不相同的。30 个省级行政单位（1990 年末的数据）中，五十年代就已经建立了省级三自委员会的有 18 个，六十年代设置了该机构的省份有 1 个，文革结束后宗教政策回复之后的 80 年代刚刚设置该机构的省份也有 7 个<sup>61</sup>。这样，在地方组织的设置上落后了得三自组织，就没有能够充分建立起本组织内部的上意下达的领导系统。结果就是，一些地方性的三自组织，更多接受的是同级别的党政机关的领导，而非来自上级三自组织的领导。

实际上，在教会的恢复、信徒的私宅等教会之外的场所的集会（家庭聚会）等问题的处理上，地方级别的统战部和政府的宗教事务局拥有绝大的权力。在恢复教会活动的过程中，需要把文革中被其他机关没收的属于教会的建筑物等不动产归还给教会，建筑物如果被破坏了，或者损伤严重，还要进行赔偿，这个过程里就非常需要各级党和政府机关的理解和支持，统战部和宗教局在党和政府内部进行积极的斡旋是非常需要的。此外，各地的宗教局，试图把那些进行家庭聚会的信徒合并到三自组织旗下的教会中。兰伯特曾经对中国的基督教会进行了 40 年以上的调差，现在担任国际福音宣教会（原来的中国奥地布教团）的中国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根据他的研究，浙江省慈溪县（现在的慈溪市）的宗教局在县内的教会组织回复活动时，发布了以下内容文章。县宗教局允许这 11 位基督徒设立教会委员会，并在县党委和政府的指导下推进教会活动的恢复工作。同时，废除了县内所有的家庭教会，所有的基督徒都被要求到新建的教会去活动。据说该地方宗教局的这种举动，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sup>62</sup>。本文前面的内容中曾经提到过，在一部分的省份，曾经出现过以三自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基督教信徒爱国守法公约》的现象，这也可以认为，是在当地统战部以及宗教局的巨大影响下进行的。根据以上考察，地方三自组织及教会所受到的横向和纵向双重领导中，后者的力度更强一些。

### （三）对宗教活动的管理的强化

#### 1. 统一战线原则外的宗教活动的活跃化

<sup>60</sup>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同前书，三六二-三六九页。

<sup>61</sup>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中国宗教团体资料第一辑》（出版地不明：中国社会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一一-六五九页。

<sup>62</sup>Tony Lambert,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91),pp .74-78.

阻碍改革方案实施的不只是三自委员会内部的人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开始指向宗教活动，尤其是对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强化，间接阻碍了改革方案的推进。其背后是因既有的统一战线原则外的宗教活动的活跃化而产生的危机意识。

一九八二年二月，在浙江省金华市的东阳县和义乌县，县三自委员会创立预备小组与拒绝加入三自委员会的教会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事件，参考多份资料所整理出的关于此次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sup>63</sup>：负责集结县内所有教会的创立预备小组，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中旬召集了东阳县内的全部牧师开展学习会。但是，一部分教会拒绝参加此次学习会，并在会场周围举行了祈祷集会。因此，三自委员会方面在月末连同公安人员和民兵闯入了未出席学习会的北门礼拜堂，使用暴力手段中止了集会。同一天，在义乌也发生了创立预备小组与拒绝加入三自委员会的教会之间的冲突事件。

不久以后，香港的基督教杂志报道了此次东阳义乌事件，并在国外的基督教界引起了轰动。三自委员会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部门高度关注此事。一九八三年二月，共产党方面派江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与统战部、公安部、宗教事务局的人员赴东阳县与义乌县调查。江平率领的调查团将这一事件定义为由“呼喊派”所引发的扰乱社会秩序事件。此处所提及的“呼喊派”是上文中的基督教聚会处的倪柝声的门徒李常受领导的教派，因礼拜时呼喊主的名字而得名。这份调查报告指出，“呼喊派”在浙江省各地广纳信众、行使暴力，并反对党、政府与三自委员会的领导，被视为扰乱社会秩序的教派<sup>64</sup>。

根据这份调查书，共产党展开了取缔“呼喊派”的活动。一九八三年五月，共产党统战部、公安部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制定了《关于处理‘呼喊派’问题的报告》，并经党中央批准下达至各地，加强了对“呼喊派”的取缔工作<sup>65</sup>。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判定哪一教会或信徒属于“呼喊派”的执行机构是基层的宗教局与公安部。例如，在重点开展取缔“呼喊派”工作的河南省，整肃的范围已延伸至非“呼喊派”的教派。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当地的公安机关未能充分理解“呼喊派”的定义<sup>66</sup>。因“呼喊派”原本的定义模糊不清，宗教局、公安部门以及地方上的三自组织将不服从三自组织的所有教会势力一律视为“呼喊派”，以便解散、取缔这些教会。

<sup>63</sup>赵天恩、庄婉芳，同前书，三二六-三二八页。李坚《浙江义乌事件实录》《中国与教会》第二十六期，一九八三年，二十一-二十二页。邓福村《所谓“东阳义务事件”的真相》《天风》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十八页。浙江省公安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公安志》（北京：中华书局，二〇〇〇年），一一五-一一七页。李常受神学思想资料室《关于全能神教、东方闪电、常受主派、呼喊派等异端邪教盗用混淆李常受职事的严正声明（二）》（[http://www.witnessleeteaching.com/affirm/WLTO\\_statement2.htm](http://www.witnessleeteaching.com/affirm/WLTO_statement2.htm)，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阅览）。

<sup>64</sup>《关于“呼喊派”问题的调查报告（一九八三年二月）》江平编《民族宗教问题论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三〇-三三六页。

<sup>65</sup>郑晓春《正也河南、邪也河南？》（香港：建道神学院，二〇〇六年），七十七-七十八页。金华市公安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金华市公安志》（北京：方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〇一页。

<sup>66</sup>Bob Whyte, *Unfinished Encounter* (Glasgow: Collins, 1988), pp.406-407.

在对“呼喊派”实施取缔以后，接连出现了在统一战线原则外开展宗教活动和布教的教会。继“呼喊派”之后，“全范围教会”成为共产党关注的对象。一九八四年前后，徐永泽领导的“全范围教会”以河南省为中心广收信徒，“全范围教会”的教义站在基要派的灵恩主义的立场，重点在于举行激昂情绪的集会、唤起强烈的信仰的觉醒<sup>67</sup>。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共产党举办了针对河南省和河北省内的基督教与天主教政策的报告会。会上，习仲勳（常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判定“全范围教会”是经香港传入大陆的反动势力，当为取缔的对象。另外，在此次会议上，习仲勳表明，有些人自称为传道者，广泛活跃在河南省内的教会，他们的活动属于违法行为，应予以制止<sup>68</sup>。据此共产党有意阻止农村广泛传播的异端信仰的意图清晰可见。

在加强治理“呼喊派”等教派的同时，共产党制定了强化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的方针。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举行的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上，习仲勳提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坚持贯彻“十九号文件”的方针，同时，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行政指导<sup>69</sup>。这是针对宗教活动场所政策重心的转移。此前，根据“十九号文件”，工作的重点是将寺院与教会的土地和建筑物等返还、赔偿给宗教团体。然而，在此次会议上，虽然承认返还与赔偿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下达给各地的宗教局干部的指示是今后应加强对已返还并对信徒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

这样一来，面对异端信仰在农村传播的局面，三自组织也有必要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在丁光训提出三自组织教会化的成都会议上，三自组织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农村教会工作的决议》。占有绝大多数基督教信徒的农村，受过充分神学训练的牧师与布道者严重不足，因此，异端信仰与外国传教团体的秘密活动接二连三。基于这种认识，会议通过了上述决议。决议规定，今后在农村开设神学专修教室或圣经学校，对于牧师较少的农村教会，由省级三自组织负责巡视或访问<sup>70</sup>。

另外，这一时期，海外的基督教团体开始（或是恢复）频繁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这对党和政府，抑或是三自组织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中国涌入了大批的海外团体。香港的基督教教徒、华侨基督教教徒，以经商的名义便能走访大陆沿海附近的区域<sup>71</sup>。同时，欧美的基督教教徒以英语老师的身份来到大陆，向学生宣传基督教<sup>72</sup>。

---

<sup>67</sup>Ryan Dunch,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Today:Fragile,Fragmen-ted,Flourishing,"Stephan U halley,Jr.and Xiaoxin Wu eds.,*China and Christ-ianity:Burdened Past,Hopeful Future*(Armonk:M.E.Sh arpe,2000), pp.200-201.

<sup>68</sup>郭伟《宗教工作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习仲勳同志》《中国宗教》二〇〇二年第五期，八-九页。

<sup>69</sup>习仲勳《全国深入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中国民族》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四-六页。

<sup>70</sup>《全国两会常委会在蓉举行连席会议》《天风》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二-四页。《全国两会常委会通过的四项决议》《天风》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六页。

<sup>72</sup>邓小平《小平看知识分子福音工作》《中国与福音》第一期，一九九四年，十三-十四页。



另外，一九八一年，在广东省汕头市，实施了由香港传教团体制定的“走私”圣经计划。这些来自海外的基督教的传入，助长了在三自组织指导系统外的教会势力。

农村异端信徒的增加、海外基督教团体的活动，成为困扰政府的公安部门与三自组织的原因。在农村出现了自称为主的人，来自河南的传道者大肆宣传与自由主义神学对立的灵恩派的礼拜，这样的事情都被刊登在三自组织发行的杂志《天风》上<sup>73</sup>。来自海外的基督教的传入，助长了三自组织指导系统外的教会势力。这种局面充分证明，尤其是在三自组织内部的保守派看来，信奉中国基督教“正统”教义的三自组织依然是目前中国所必须的。三自组织原本首要的存在意义是使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的基督教扎根于中国，因此，中国对外开放态度的巨大转变，淡化了这一组织的存在意义。但是，因对外开放而盛行的异教信仰、海外的基督教团体展开的活动，放大了将其取缔的必要性，一度动摇的三自组织的存在意义重新突显出来。

## 2.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与取缔的强化

从以上内容来看，在三自组织内部，围绕基层教会活动的管理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尽量限制来自宗教局、公安等行政机关的管理，由三自组织及其下属教会的信徒独自经营。另一方面，三自组织也认识到取缔接连出现的、以农村为中心的的异端信仰的必要性。田林会议通过了《关于三自爱国组织与基督教协会的关系正常化的决议》，但是，该项决议仅限于按照各级三自委员会与基督教协会各自的会规，明确工作上的分工与合作。而且，此次会议决定延期举办下次的全体委员会议，推迟关于委员会改组的讨论<sup>(75)</sup>。由此可见，对坚持既得权益的三自组织委员改组案的反对意见非常坚决。

在改组案被推迟期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天安门事件及之后的东欧解体，大幅提高了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宗教的警惕心。一九九〇年四月，共产党元老陈云亲笔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宗教问题不应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同月，这封书信被上交至党中央上层，宗教政策进一步受到重视<sup>(76)</sup>。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举行的全国宗教会议上，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出席并发表讲话，这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宗教工作会议。此外，自一九九一年一月开始，每年固定召开由共产党总书记、担任统一战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务委员和各爱国宗教团体的领导出席的座谈会。一九九一年二月，党中央与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依法规定了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县级以上政府必须设置宗教工作部门等事项<sup>(77)</sup>。天安门事件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新动向，最终使改革大众团体与爱

---

73 《天风》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十二-十三页。

（《读者信箱》《天风》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二十六-二十七页。李吉鲜《坚决抵制“生命会”的异端邪说》《天风》一九九一年第十期，二十九页。

(75) 《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第三次常委会连席会议决议》《天风》一九八九年四期，十四页。

(7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同前书，一七七页。

(7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同前书，二一三-二二一页。

国宗教团体的声音彻底消失。

####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基督教，不仅信徒数量增加，而且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现代派、基要派以及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异端信仰等多样化的教派，也有信仰形态的“复活”的形式。在这种局面之下，中共试图利用建国初期制定的统一战线原则予以应对。但是，该项原则的制定，是在以现代派为中心的基督教信徒的协助下完成的。另外，虽然聚集了其他教派的信徒，但是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三自组织及其下属教会的怀疑，使这一原则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为了打破这一局限，时任三自组织领导的丁光训等人提出制度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方案的实施，首先受到来自农村增长的异端信徒的阻碍。对于异端信徒增加的态度，共产党、政府与三自组织的改革派、保守派是一致的，各方都是警惕和抗拒的。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体制、维持社会治安，党和政府不能忽视异端信仰的盛行与扩张。在制度上，信仰分为被视为正统的五大宗教与反动会道门、邪教。但是，两者在实际上并无明显的界限。执政党和政府甚至将取缔的对象延伸至处于界限边缘的信仰团体，大概是希望将影响体制的不安定因素降到最低吧。三自组织内部的改革派也表示，不能放任偏离基督教正统教义的信仰的发展。问题在于，欧美的基督教国家由教会决定正统与异端的界限，在中国，则是由共产党和政府认定“邪教”。带有政策执行机构性质的三自组织，若无正当理由反对政府的决定，就必须协助取缔被政府认定为“邪教”的集团。

这种局面对三自组织的保守派极其有利。宗教管理与取缔工作的加强，作为执行这一政策的机构，三自组织的存在意义得以持续。三自组织的保守派希望保留这一组织，他们指出，党和政府所说的海外教会势力对国内不断构成威胁、农村的异端信仰又在持续扩张，这些都使三自组织无法改变。另外，他们与当地的宗教局干部形成了一种庇护关系。在一些地方，宗教局干部掌握着三自组织干事的实际任免权，因此，三自组织与宗教局协同合作，被认为是获取自身利益的合理行为。中央下发了加强管理宗教场所的命令，各地的宗教局采取行动全面加强治理，地方上的三自组织在此之上配合（或者必须配合）。

共产党的目标是利用三自组织全面管理基督教信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三自组织必须完美地平衡各方关系。既要认真贯彻执行党与政府的政策，与此同时，也要走近信徒、倾听他们的要求与意见，并传达给党和政府。但是，地方上的三自组织被束缚在封闭的利益结构中，被置于以加强管理地域内的宗教活动为任务的政府机关的支配之下。而且，三自组织制度外的一切家庭教会因得到海外的支持，持续发展。现存的基督教信徒管理制度带有难以克服的缺陷。

# 中国国内具有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的是哪些人群

## ——基于2012年反日示威游行前爆发的居民认识调查

陈嵩

(东京大学)

### 导言

近年来，围绕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日中两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目前，通过政府间协商对话方式依然难以有效解决两国之间的纠纷。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国内民众对于此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增长，同时，相关社会舆论也甚嚣尘上。特别是2010年9月在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海域附近发生的渔船撞击事件成为了社会舆论爆发的导火索。在处理渔船撞击事件的过程中，部分中国民众保卫领土的意识和反日感情被点燃（陈嵩，2014：122），从而导致了在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活动。此外，2012年，为抗议日本政府对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进行了所谓的“国有化”，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活动，在此背景下，日中两国关系陷入自两国建交以来最困难的局面。

在日本国内，针对中国近年来不断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也产生了不同的认识。首先，有的观点认为反日示威游行活动是由中国官方发起和主导。例如，对于2012年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日本共同通信社指出：有组织地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其背后可以看到政府当局影子。<sup>1</sup>此外，也有观点认为，在对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主张领土主权的中国爆发的示威游行活动其实是政府主导的反日活动。<sup>2</sup>另一方面，除了上述“官方主导”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示威游行活动并非由政府主导。例如，富坂聪认为有的日本媒体认为在中国爆发的一系列反日游行示威活动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sup>3</sup>此外，也有观点认为，虽然政府在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示威游行活动本身也体现了民众的自发性。<sup>4</sup>例如，城山英巳（2013：35）对于2012年爆发的反日示威

<sup>1</sup> 共同通信社：反日デモに当局の影 中国、組織的に動員か。2012年9月20日，<http://www.47news.jp/CN/201209/CN2012092001000812.html>，2014年7月2日访问。

<sup>2</sup> 河崎真澄：反日デモ半年余メディア論調に10段階の変化。MSN产经新闻，2013年3月31日。

<sup>3</sup> [http://www.pressnet.or.jp/news/headline/121129\\_2194.html](http://www.pressnet.or.jp/news/headline/121129_2194.html)（一般社団法人日本新闻协会）。

<sup>4</sup> “尖閣問題長期化に伴う諸問題（現状と予測）”（上海通信Vol.93，2012年9月25日）对于2012年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分析指出，“（中略）冷静思考之后，可以看出将如此大规模的示威

游行活动是民众自发组织的，还是背后由政府主导的，对此，其分析认为，虽然存在政府主导的因素，但是也体现出以爱国和反日感情为代表的人民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到难以抑制的程度。

如此，可以看出中国民众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并不必然真实反映出中国民众的参与意愿。相反，反日示威游行活动更可能是政府采取动员、封锁、取缔等手段，民众与政府相互博弈后的结果。有的观点认为，在分析中国出现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时，考察政府与民众之间力量的变化不可或缺。<sup>5</sup>但是，在现有的有关反日示威游行活动分析中，更多的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政府发挥的作用，而忽视了系统分析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中民众自发性的因素。由此，不仅导致过分夸大政府在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民众自身的作用，而且导致在分析中国爆发的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活动时中国民众视角的缺失。

对此，本文将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行动者之一的中国民众作为分析对象，试图明晰在围绕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中，中国民众的参与意愿以及影响参与意愿的变量。

##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

### 1. 文献综述及假设

由于日本政府对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采取国有化措施，导致2012年9月在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围绕“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产生了一系列风波强化了民众对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的关注程度。

#### （1）有关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特点及民众参与动机的现有研究成果

以2012年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哪些人群、在何种动机下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城山英巳，2013；福岛香织，2012；森功，2012；川村范行，2014）。

究竟哪些人群参加了反日示威游行活动？根据在反日示威游行活动前线进行采访的记者们的观察，有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参加了反日示威游行活动（城山英巳，2013：30）。不同于2005年和2010年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2012年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参与者中，有很多是城市低收入人群以及第二代农民工。<sup>6</sup>此外，与采用暴力方式参与示威游行活动的外出务工人员不同，参加示威游行的人群中也包括试图与上述外出务工人员保持距离的中产阶

---

游行活动看作由政府主导是毫无道理的”。

<sup>5</sup> 同注③。

<sup>6</sup> 例如，富坂聪认为参加示威游行的半数以上人群是无业人群和低收入群体（参见注③）。根据在北京对反日示威游行活动进行采访报道的城山英巳的分析，参加2012年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人群中，外出务工人员等地方出身人群的比例较高（城山英巳，2013：31）。

级<sup>7</sup>以及属于理性派的知识分子。反日示威游行活动凸显了不同阶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鸿沟（福岛香织，2012：254-257；城山英巳，2013：41）。

为什么属于低收入人群的外出务工人员参与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积极性更高？对此，现有的文献进行了如下的分析。相对于生活在内陆城市和中小城市并处于相同收入水平的人群，生活在大城市的外出务工人员面对着更大的收入差距，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认为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通过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活动表达对日本的愤怒以及宣泄自身的不满（陈嵩，2014：123）。其中，第二代农民工虽然其父母是在城市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但是，其中很多人都是在城市长大当中。他们虽然怀有与城市年轻人相同的志向，但是其自身并不具备实现这种志向的能力，同时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些人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由此，其在挫折面前表现得非常脆弱（福岛香织，2012：257-260）。

此外，有的研究指出，2012年不同地区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情况亦有所不同。<sup>8</sup>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状况观测调查》<sup>9</sup>，从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地区分布来看，2012年，东部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的人数为1亿6980万人，占全国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64.7%，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分别为4706万人和4479万人，分别占到全国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17.9%和17.1%。如果将外出务工人员作为2012年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主力的话，那么则可以理解不同地区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呈现不同的景象。这主要是因为地区不同，外出务工人员流入情况不同。

其次，人们为什么参加示威游行？很多记者和学者对于中国民众参加示威游行的动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有的观点认为对日常生活的不满参加示威游行的原因。2012年反日示威游行甚嚣尘上的背后隐藏着对社会的不满（福岛香织，2012：240），年轻人发泄对日常生活中的不平，将这种不满宣泄到日本身上（城山英巳，2013：29）。此外，也有的研究指出，爱国情怀、反日情绪等民众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是原因之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年轻人内心燃烧起保卫领土的爱国意识（川村范行，2014：33），再加上在历史认识问题以及领土主权问题方面对日本政府的表现感到不满，从而最终演变成激烈的示威游行行为（城山英巳，2013：29-35）。同时，对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出现而负有责任的中国政府的不满（“反日示威游行行动下隐含着对阶层分化的不满”，《朝日新闻》，2012年9月29日）以及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出现的自信上升也构成了反日示威游行激化的背景因素（城山英巳，2013：35）。

除此之外，在参加示威游行人群的年龄分布方面，川村范行（2014：33）研究指出，20

---

<sup>7</sup> 按照福岛香织（2012）的话说，可以推测主要是指相较于中间收入群体，身处相对较高阶层的中高收入群体。以下将其称之为“中高收入群体”。

<sup>8</sup> 例如，相对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极端的暴力行为受到压制，在西安、青岛等地方城市，示威游行演变为暴力行为（城山英巳，2013：30）。

<sup>9</sup>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305/t20130527\\_12978.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305/t20130527_1297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9月10日。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成为了示威游行的主要参与者。此外，根据兴柁一郎（2013：20）的研究，参加示威游行的外出务工人员中很多属于低学历人群，其中，初中毕业人群占到了六成左右。根据《2012 年全国农民工状况观测调查》的统计，男性占到了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 66.4%。由此，可以推测参与反日示威游行的人群中男性数量较多。

### （2）现有研究的局限性

城山英巳、福岛香织、森功等记者通过观察参加反日示威游行人群，总结了示威游行表现出的特征，推测人们参加示威游行的动机。此外，川村范行等学者通过对反日示威游行进行细致的分析，对于人们为什么参加示威游行，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上述相关分析研究分别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但是，其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中国，示威游行并非必然是民众自由意志的表达，人们即使具有示威游行的意愿，受限于政府施加的压力以及采取的压制措施，难以开展示威游行活动；相反，在一定的场合下，政府也会动员群众发起示威游行。因此，无论是否参加了示威游行，通过调查人们参加示威游行意愿的情况，可以客观地明确参加示威游行人群的特征及其动机。

城山英巳和福岛香织研究发现，不同地区的示威游行程度不同，且参加示威游行中的低收入人群的数量相对较多。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政府的限制和动员的结果，亦或是不同地区 and 不同阶层的人们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有所不同？对于为什么参加示威游行，通过对参加示威游行的人群进行调查，进而验证其参加的动机<sup>10</sup>，这种方法比较困难。因此，本研究关注人们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通过客观分析哪些变量对于人们参与意愿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验证现有有关人们参加示威游行动机的研究成果的有效性，探索具有一般性的解释模型。<sup>11</sup>

### （3）设定假设

首先，关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在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方面是否存在差异，设定了两个假设进行验证，具体如下。

假设 1：低收入人群的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更强。

假设 2：东部地区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更强。

其次，研究发现对人们参加示威游行具有正向作用的变量是否对提高人们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具有正向作用，对此，将通过对个人属性（假设 3-5）、日常生活的满意度（假设 6）、对日本的认识（假设 7）、爱国认识（假设 8）、中国政治（假设 9）、经济（假设 10）等的认识提出 8 个假设进行验证。

假设 3：越是年轻人，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越强。

假设 4：越是低学历人群，其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越强。

---

<sup>10</sup> 研究发现，上述有关 2012 年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研究分析与其他国家类似研究之间存在差异。例如，有关 20 世纪 60 年代亚洲及非洲城市中流氓无产阶级的研究（ハンティントン，1972：298-307）认为，城市中农民工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等低收入群体通过城市生活改善了生活，基于社会服从以及预期水平低下，因此，并不期待政府能够改善现状。

<sup>11</sup> 有关分析促进中国民众参与反日示威游行活动内在因素的现有研究发现如果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因素应当具有增进人们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活动意愿的效果。

假设 5: 男性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较强。

假设 6: 越是对日常生活不满的人群, 其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越强。

假设 7: 越是对日本好感度低的人群, 其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越强。

假设 8: 越是爱国感情强烈, 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越强。

假设 9: 越是对政治不满, 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越强。

假设 10: 越是对中国经济感到自信, 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越强。

属性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收入、地区)和认识变量(对日常生活的满意度、对日本的认识、爱国意识、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认识)作为自变量, 分阶段对作为因变量的“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 使用强行进入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2. 研究方法

### (1) 分析方法和数据

本研究中使用的是 2012 年 5 月 20 日至同年 6 月 26 日在中国国内 7 个地区<sup>12</sup>进行调查的数据。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从 7 个地区中抽出 1 个省(或者相当于省的行政单位), 每个省抽出 1 个市(或者相当于市的行政单位), 每个市的城区抽出一个区(或者相当于区的行政单位)每个区抽出 2 个大型住宅区(社区)(一个作为备选), 每个社区计划回收 200 份问卷, 调查采用共同调查<sup>13</sup>的方式。

### (2) 设置变量

首先, 介绍被解释变量的设置方法。设置“围绕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 如果发生反日游行示威, 你会参加吗”的问题, 在选项方面, 设置“完全不会参加”到“非常希望参加”5 个选项, 然后分别赋值 1-5 分。

其次, 对于解释变量, 在参考 AsiaBarometer、玄大松(2006: 244-249, 202-203)的基础上, 设置如下:

---

<sup>12</sup> 围绕2012年9月日本政府对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采取国有化措施发生的一系列风波出现之前, 于2012年5月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调查没有考虑相关人口比率问题, 调查对象为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中国大陆地区。调查的七个地区分别为: 东北地区的辽宁省(大连市n=169, 问卷回收率78.2%)、华北地区的北京市(调查对象为学生群体)和河北省(张家口m=159, 问卷回收率58.2%)、华东地区的江苏省(镇江n=212, 问卷回收率52.6%)、西南地区的重庆市(渝中区n=114, 问卷回收率57.6%)、西北地区的陕西省(西安市n=159, 问卷回收率71.3%)。

<sup>13</sup> 问卷调查由笔者和东京大学Graduate 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Information Studies研究生院的3年级博士生(2012)江晖共同实施。调查问卷设计主要基于调查实施方各自感兴趣的事项, 由三部分构成。F1-F10是人口统计属性变量, Q1-Q18是江晖负责的“外国印象和媒体的利用”的调查部分Q19-Q41是笔者负责的“领土问题认识”调查部分。有关调查设计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江晖(2013: 227-228)。

a. 为验证假设 3-5, 在属性变量方面<sup>14</sup>, 设置 (1-1) 性别、(1-2) 年龄、(1-3) 学历、(1-4) 收入<sup>15</sup>、(1-5) 地区等 5 个变量。

b. 在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标 (假设 6) 方面, 设置“对于 (2-1) 住房、(2-2) 个人年收入、(2-3) 食品安全、(2-4) 人身安全、(2-5) 社会公平, 你是否感到满足”的问题, 在答案方面, 设置“完全不满意”到“非常满意”5 个等级, 然后分别赋值 1-5 分。

c. 有关对日本的认知 (假设 7) 方面, 设置了如下 2 个问题。首先, 设置“(3-1) 是否认为今后应当构建更为紧密的日中关系”的问题, 在答案方面, 设置“完全不同意”到“非常同意”5 个等级, 然后分别赋值 1-5 分。其次, 对于“(3-2) 你是否喜欢日本”问题, 设置“完全不喜欢”到“非常喜欢”5 个答案, 然后分别赋值 1-5 分。

d. 在爱国心指标<sup>16</sup>(假设 8)方面, 设置“(4-1)是否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4-2)是否认为中国人比外国人优秀”两个问题, 答案方面分别设置“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 个选项, 分别赋值 1-5 分。

e. 在中国政治的认知 (假设 9) 方面, 设置“(5-1) 是否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需要向外国学习<sup>17</sup>”、“(5-2) 是否认为在很多方面应当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5-3) 是否认为在中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三个问题, 答案分别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 个选项, 分别赋值 1-5 分。

f. 对于中国经济的认知 (假设 10), 设置“(6-1) 是否认为中国今后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问题, 答案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 个选项, 分别赋值 1-5 分。

---

<sup>14</sup> 有关属性变量的详细说明, “性别” (男性虚拟变量: 0=女性、1=男性); “年龄”方面, 根据出生年代不同, 将其分类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设置50年代虚拟变量、60年代虚拟变量、70年代虚拟变量、80年代虚拟变量; “学历”方面, 分类为初中以下学历、高中学历、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 设置高中学历虚拟变量、大学学历虚拟变量和研究生学历虚拟变量3个变量; “收入阶层”方面, 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中有关“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分类, 按照个人年收入情况, 划分为最低收入群体 (年收入在1.15万元以下)、中低收入群体 (年收入在1.16-2.45万元)、中间收入群体 (年收入在2.46-3.28万元)、中高收入群体 (3.29-6.99万元)、高收入群体 (年收入在7万元以上), 在此基础上, 设置中低收入群体虚拟变量、中间收入群体虚拟变量、中高收入群体虚拟变量、高收入群体虚拟变量等4个变量; “地区”因素方面, 在7个地区中, 将其中的6个地区设置为虚拟变量 (张家口虚拟变量、镇江虚拟变量、广州虚拟变量、南昌虚拟变量、重庆虚拟变量、西安虚拟变量)。

<sup>15</sup> “个人年收入”是“家庭年收入”除以“家庭人员数量”后得出。

<sup>16</sup> 有关韩国学生的独岛认识问题研究 (玄大松, 2006) 方面, 研究认为“作为韩国人的自豪感”、“政治满意度”“民族认同”以及“爱国心”等方面的指标对于韩国学生的“独岛/竹岛认识”具有影响。

<sup>17</sup> 有关此问题, 虽然一般认为难以理解政治认识问题, 但是由于此问题的问卷调查中设置了有关国家和政府认识的问答部分, 因此, 可以认为调查对象的回答是基于国家和政府认识基础之上。



## 二、分析结果

### 1. 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阶层人群对日本的好感度

在检验假设之前，分析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阶层人群对日本好感度分布呈现出的特点。对于问卷中有关“你是否喜欢日本”问题的回答，按照不同地区统计的结果见表 1，有关不同收入阶层人群回答的结果见表 2。

通过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阶层人群对日本好感度的均值检验，结果发现地域变量对结果具有显著性影响 ( $p < .05$ )，但是，通过 Tukey 方法进行多重比较后，发现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发现不同收入群体的对日好感度原本并不显著。

表 1 不同地区人群对日好感度

	完全不 喜欢	不怎么 喜欢	不清楚	比较喜欢	非常 喜欢	合计
华北张	49	41	33	24	11	158
家口	(31.0%)	(25.9%)	(20.9%)	(15.2%)	(7.0%)	(100.0%)
华东镇	56	63	59	27	7	212
江	(26.4%)	(29.7%)	(27.8%)	(12.7%)	(3.3%)	(100.0%)
华南广	33	21	31	24	3	112
州	(29.5%)	(18.8%)	(27.7%)	(21.4%)	(2.7%)	(100.0%)
华中南	42	75	80	27	1	225
昌	(18.7%)	(33.3%)	(35.6%)	(12.0%)	(0.4%)	(100.0%)
东北大	35	38	46	41	8	168
连	(20.8%)	(22.6%)	(27.4%)	(24.4%)	(4.8%)	(100.0%)
西南重	17	23	52	17	4	113
庆	(15.0%)	(20.4%)	(46.0%)	(15.0%)	(3.5%)	(100.0%)
西北西	42	42(26.4)	49	21	5	159
安	(26.4%)		(30.8%)	(13.2%)	(3.1%)	(100.0%)
合计	274	303	350	181	39	1147
	(23.9%)	(26.4%)	(30.5%)	(15.8%)	(3.4%)	(100.0%)

数据来源：2012 年问卷调查结果

表 2 不同收入阶层人群对日好感度

	完全不 喜欢	不怎么 喜欢	不清楚	比较喜欢	非常 喜欢	合计
最低	75	74(26.9%)	87(31.6%)	33(12.0%)	6	275
收入	(27.3%)				(2.2%)	(100.0%)
阶层						

中低收入阶层	86 (24.2%)	99(27.8%)	103 (28.9%)	55 (15.4%) (3.7%)	13 (3.7%)	356 (100.0%)
中间收入阶层	22 (20.6%)	25(23.4%)	37 (34.6%)	17 (15.9%) (5.6%)	6 (5.6%)	107 (100.0%)
中高收入阶层	60 (21.4%)	75(26.8%)	82 (29.4%)	52 (18.6%) (3.9%)	11 (3.9%)	280 (100.0%)
高收入阶层	19 (21.1%)	22(24.4%)	28 (31.1%)	18 (20.0%) (3.3%)	3 (3.3%)	90 (100.0%)
合计	262 (23.6%)	295 (26.6%)	337 (30.4%)	175 (15.8%)	39 (3.5%)	1108 (100.0%)

数据来源：2012 年问卷调查结果

## 2. 不同地区间“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的差异

首先，验证了假设 2 是否与实际的数据相符。不同地区间“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的特点见表 3。

此外，为检验参加意愿均值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如表 4 所示， $F(6870) = 4.69$ ，在 0.1%水平上显著相关。也就是说，不同地区的民众其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不同。通过 Tukey 方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发现西安、张家口、镇江、广州的民众相比重庆地区的人群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更为强烈，而且相比南昌和大连也呈现出强烈的意愿。因此，结果支持假设 2，即东部地区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更强。

表 3 不同地区人群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

	完全不 愿意 参加	不怎么 愿意参加	不清楚	比较愿意 参加	非常 愿意参加	合计
华北张 家口	10 (7.3%)	17 (12.4%)	41 (29.9%)	43 (31.4%)	26 (19.0%)	137 (100.0%)
华东镇 江	12 (7.4%)	16(9.9%)	71 (43.8%)	41 (25.3%)	22 (13.6%)	162 (100.0%)
华南广	5(5.3%)	11	44	23	11	94

州		(11.7%)	(46.8%)	(24.5%)	(11.7%)	(100.0%)
华中南		16	61	39		124
昌	4 (3.2%)	(12.9%)	(49.2%)	(31.5%)	4 (3.2%)	(100.0%)
东北大		13	19	72	25	142
连	(9.2%)	(13.4%)	(50.7%)	(17.6%)	13(9.2%)	(100.0%)
西南重		16	37	11		75
庆	7 (9.3%)	(21.3%)	(49.3%)	(14.7%)	4 (5.3%)	(100.0%)
西北西		15	51	49	22	143
安	6 (4.2%)	(10.5%)	(35.7%)	(34.3%)	(15.4%)	(100.0%)
合计	57	110	377	231	102	877
	(6.5%)	(12.5%)	(43.0%)	(26.3%)	(11.6%)	(100.0%)

数据来源：2012 年问卷调查结果

表 4 不同地区间“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分散分析的结果<sup>18</sup>

调查地点	n	MEAN	SD
华北张家口	137	3.42	1.15
华东镇江	162	3.28	1.06
华南广州	94	3.26	.99
中部地区 华中南昌	124	3.19	.82
东北地区 东北大连	142	3.04	1.02
西部地区 西南重庆	75	2.85	.97
西部地区 西北西安	143	3.46	1.01
F 检验	F=4.69	df=6870	p<.00

注：1. MEAN 表示均值，SD 表示标准差。

2. 个人年收入参考《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进行分类。

数据来源：2012 年问卷调查结果

表 5 不同收入阶层“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的分散分析结果

<sup>18</sup> “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整体上超过了3分。在以一般市民为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中，得分超过3分意味着市民的平均回答是“比较想参加”，对此，笔者认为人类具有避免被孤立的自然欲求，具备观察周围的情况，直观把握其他人意愿趋势的能力。因此，对于某一争论，如果感觉到自己属于少数派或者处于不利地位，那么就会倾向于压抑表达清楚的意见。由于属于刺激民族主义的话题，因此，抱有参加意愿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回答“愿意参加”，但是对于那些不愿意参加的人群来说，由于担心受到不同立场人群的批判，相对于表达“不愿意参加”意愿的选项1和选项2，这些人更愿意倾向于选择选项3，即“不清楚”选项。由此，可以解释平均得分超过了3分的情况。

收入基层/个人年收入 (元)	n	MEAN	SD	
最低收入阶层	0-1.15 万	227	3.42	1.09
中低收入阶层	1.16-2.45 万	261	3.26	1.02
中间收入阶层	2.46-3.28 万	75	3.17	1.05
中高收入阶层	3.29-6.99 万	210	3.07	1.05
高收入阶层	7 万以上	77	3.25	.83
F 检验	F=3.26	df=4845	p<.05	

注：1. MEAN 表示均值，SD 表示标准差。

2. 个人年收入参考《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进行分类。

数据来源：2012 年问卷调查结果

### 3. 不同阶层“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的差异

其次，为检验假设 1“低收入人群的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更强”是否与实际的数据相符，检验了“5 个收入阶层参加意愿”的平均值差异。

如表 5 所示，5 个收入阶层间在 0.05 水平显著，“收入阶层”对结果具有正相关。通过 Tukey 法进行多重比较后发现，“最低收入阶层”参加意愿相较于“中高收入阶层”在 0.1% 水平显著。因此，总体而言，低收入阶层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相对强烈。

按照不同地区对上述分析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张家口、镇江、广州、西安、南昌最低收入阶层人群“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大连和重庆最低收入阶层人群的参加示威游行意愿相对较低（表 6）。基于上述分析，发现由于存在相反案例，因此不支持假设 1“低收入人群的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更强”。

表 6 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的特征

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		最低	中低	中间	中高	高	F 检 验
		收入阶层	收入阶层	收入阶层	收入阶层	收入阶 层	
张 家 口	n	48	38	10	26	14	F=9. 34
	MEAN	4.13	3.29	3.00	2.81	2.9	df=4 131
	SD	.94	1.11	.94	1.20	.73	p<.0 01
镇 江	n	20	58	14	58	9	F=.6 1
	MEAN	3.55	3.31	3.21	3.14	3.3	df=4

						3	154
	SD	1.00	1.10	.80	1.07	1.2	n. s.
	n	13	22	8	32	16	F=1.08
州	MEAN	3.46	3.45	3.00	3.00	3.3	df=4
	SD	1.13	.86	.76	1.16	.48	n. s.
	n	25	32	14	30	15	F=1.68
部	MEAN	3.44	2.94	3.00	3.30	3.1	df=4
地	SD	.92	.91	.68	.65	.83	n. s.
昌	n	56	40	15	19	8	F=2.51
区	MEAN	2.86	3.15	3.47	2.79	3.7	df=4
	SD	1.12	.77	.99	1.08	1.1	p<.05
北	n	14	22	3	22	8	F=1.04
地	MEAN	2.64	2.77	3.00	3.23	3.0	df=4
连	SD	.63	.87	2.00	1.11	.54	n. s.
区	n	51	49	11	22	7	F=.9
	MEAN	3.51	3.59	3.27	3.14	3.5	df=4
	SD	.99	1.14	.79	.99	.79	n. s.
		F=8.53	F=2.55	F=.52	F=.90	F=1.23	
		df=62	df=62	df=66	df=62	df=670	
		p<.001	p<.05	n. s.	n. s.	n. s.	
个人年收入		0-1.15万元	1.16-2.45万元	2.46-3.28万元	3.29-6.99万元	7万元以上	

#### 4. “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归因分析

最后，为检验假设 3-11 是否与实际数据相符，属性变量和认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层次多元回归分析。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7。

表 7 影响参加反日示威游行变量的层次多元回归分析

		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	
		$\beta$	r
属性变量			
地区（大连）	张家口虚拟变量	.133**	.062*
	镇江虚拟变量	.105*	.016
	广州虚拟变量	.101*	-.01
			1
	南昌虚拟变量	.098	.010
	重庆虚拟变量	-.016	-.10
		1**	
	西安虚拟变量	.161***	.083*
性别（女性）	男性虚拟变量	.004	.015
出生年代（70 年代）	50 年代虚拟变量	-.070	.006
	60 年代虚拟变量	-.074	.045
	80 年代虚拟变量	-.226***	-.17
		6***	
学历（-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虚拟变量	-.093	.070*
	大学毕业虚拟变量	-.107	-.06
			6*
	研究生毕业虚拟变量	-.075	-.05
		2	
收入阶层 （最低收入人群）	中低收入人群虚拟变量	-.046	.028
	中间收入人群虚拟变量	-.032	-.01
			3
	中高收入人群虚拟变量	-.138**	-.11
			6**
	高收入人群虚拟变量	-.002	.013
R <sup>2</sup>		.080***	

Adj. $R^2_1$		.059***	
认知变量 (-) 内是变量范围			
生活满意度 (1-5)	(2-1) 住房	-.015	-.019
	(2-2) 个人年收入	.037	-.017
	(2-3) 食品安全	-.008	-.004
	(2-4) 人身安全	-.043	-.046
	(2-5) 社会公平	-.094*	-.021
对日本的认识	(3-1) 构建紧密的日中关系	-.149***	-.283***
	(3-2) 对日本的好感度	-.186***	-.340***
爱国意识 (1-5)	(4-1) 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118**	.217**
	(4-2) 中国人比外国人优秀	.064	.232**
对中国政治、经济的认识 (1-5)	(5-1) 很多事情需要向外国学习	-.020	.030
	(5-2) 应当改革政治体制	.046	.102*
	(5-3) 言论自由	.115**	.243**
	(6-1) 经济高速增长	.043	.197**
$R^2$		.241***	
Adj. $R^2_2$		.209***	
$\Delta R^2 (1-2)$		.160***	
N		737	

注：1. Adj.  $R^2_1$ , Adj.  $R^2_2$ 是步骤 1 和步骤 2 调整后的决定系数。

2.  $\Delta R^2 (1-2)$ 表示步骤 2 调整后决定系数前步骤的增加部分。

3. p<.10, \*p<.05, \*\*p<.01, \*\*\*p<.001.

数据来源：2012 年问卷调查结果

首先，将属性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第 1，不同地区群体比较发现，相比大连，西安（ $\beta = .161, p < .001$ ）、张家口（ $\beta = .133, p < .01$ ）、镇江（ $\beta = .105, p < .05$ ）、广州（ $\beta = .101, p < .05$ ）在“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方面具有显著性。第 2，通过比较“出生的年代”后发现，相比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人群，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人群（ $\beta = -.226, p < .001$ ）其“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不显著。此外，相较于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人群，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人群（ $\beta = -.070, p < .100$ ）和 20 世纪 60 年代（ $\beta = -.074, p < .100$ ）出生的人群其“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相对较低。第 3，通过比较不同“收入阶层”人群发现，相较于最低收入人群，中高收入人群（ $\beta = -.138, p < .01$ ）其“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相对较低。第 4，通过分析发现，“性别”、“学历”对“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关于属性变量对中国民众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的影响，拒绝假设 3、假设 4 和假设 5，该假设认为年轻人、低学历人群、男性变量对“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此外，在属性变量基础上增加认识变量进行分后发现，整体的解释率上升到 20.9%，解释率检验在 0.1%水平显著。在标准偏回归系数（SPRC）显著性方面，发现社会公平满意度越低（ $\beta = -.094, p < .05$ ），越不认同应当构建紧密的日中关系（ $\beta = -.094, p < .001$ ），对日本好感度越低（ $\beta = -.186, p < .001$ ），越认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beta = .118, p < .01$ ），越认同在中国具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beta = .115, p < .01$ ），民众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越强。

如上，检验了认识变量对“人们参加示威游行意愿”的相关影响。第 1，通过从 5 个方面对日常生活满意度的分析后，发现民众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与提高“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 6 得到支持。第 2，研究发现对日本负面的认知、强烈的爱国情怀能够显著提高“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因此，假设 7 和假设 8 得到支持。第 3，从 3 个方面考察了对中国政治的认知问题，研究发现政治不满与参加示威游行意愿之间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拒绝假设 9。第 4，研究结果不支持对中国经济的自信与参加示威游行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拒绝假设 10。

### 三、考察

在利用 2012 年爆发反日示威游行之前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本研究检验了地区和阶层变量与起因于尖阁群岛（中国称“钓鱼岛”）领土纠纷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参与意愿之间的相关性，同时，分析了民众参与反日示威游行的相关动机。研究发现，2012 年反日示威游行爆发之前，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阶层群众在参加示威游行意愿方面存在差异，多种因素与参加示威游行意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如下，就几点重要内容进行详细论述。

#### 1. 哪些地区群众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更高



通过比较 7 个地区群众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发现东部地区的张家口、镇江、广州，西部地区的西安，这些城市群众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相对更高。总体而言，在参加示威游行意愿方面，东部地区（张家口、镇江、广州）、内部地区（南昌、重庆）、东北地区（大连）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东部地区的群众表现出更高的意愿，相反，内陆地区和东北地区群众的参与意愿相对较弱（具体见表 4）。

## 2. 哪些收入阶层群众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更高

城山英巳、福岛香织、森功等记者通过考察分析参加 2012 年反日示威游行人群，发现参加示威游行人群主要由低收入人群组成<sup>19</sup>。对此，本研究分析认为，即使在示威游行出现之前，城市低收入群体也具有强烈的参与意愿（见表 5）。

此外，分析发现，中高收入群体对参加示威游行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并非是由于政府采取限制性措施，而是原本对参与示威游行活动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但是，低收入群体对于参加示威游行表现的较为积极，而中高收入群体表现的较为消极，这种行为特征并非适用于所有地区，正如有的研究指出，在中国可以同时出现相反现象<sup>20</sup>，在大连和重庆，相较于中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对参加示威游行持消极的态度<sup>21</sup>（见表 6）。

## 3. 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的影响变量分析

哪些年份出生的人群是参加 2012 年反日示威游行的主力？现有的研究认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人群（泽，2006：61），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构成了 2012 年反日示威游行的主力军（川村范行，2014：33）。但是，本文分析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人群，其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最为强烈，而 20 世纪 50 年代和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人群，其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较弱，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人群参与意愿最低。其次，研究发现，在影响人们参加示威游行意愿的认识层面的因素方面，总体而言，反日感情和爱国感情强烈的人群、认为在中国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人群以及对社会不满的人群，其参加反日示威游行的意愿更为强烈。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言论自由的认知和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之间呈现因果关系。现有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由于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年轻人以反日为借口，表达自身对政府的不

---

<sup>19</sup> 请参考福岛香织（2012：254-257）和城山英巳（2013：31）。

<sup>20</sup> 高原明生在以东京财团 2012 年发布的“理解当今中国的 9 个视角”作为主题的政策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可以同时发生完全相反的事情的同时，仅仅依靠单一来源的信息理解日中关系的话，容易出现误判实际情况的风险。

<sup>21</sup> 不同地区民众在参加示威游行活动意愿方面呈现出差异。但是，难以由此判断民众在参加示威游行活动意愿方面所呈现的差异全部是由民众对日本好感度方面差异造成的。有关其他原因，请参考城山英巳（2013：43）。

满。如果此研究结论正确，那么，在中国，对言论自由现状不满的人群，其参加示威游行则更为积极。但是，本文研究发现，相反，认为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人群，其参加示威游行的意愿更为强烈。虽然中国也认同“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自由”<sup>22</sup>，但是，原则上，如果未得到政府的批准，则禁止举行示威游行。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清楚认知政府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主观感觉并不必然与客观情况保持一致。不同于言论相关的客观情况，人们基于自身主观感觉判断，如果认为可以参加示威游行的话，就会参加，如果自身主观感觉认为示威游行行为是被禁止的行为的话，就会对参加示威游行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因此，一般认为，主观认为在中国言论自由得到保障的人群，其参加示威游行活动是其自然选择的结果。相反，可以推测，主观认为在中国缺少言论自由的人群，其决定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活动需要非常大的决心<sup>23</sup>。

#### 4. 2012 年反日示威游行研究新的视角

本文从地区和阶层视角研究了群众参与反日示威游行活动意愿的强烈程度，由此，获得推测地方政府在 2012 年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启示。

首先，原本民众参加示威游行活动意愿不高的重庆和大连，2012 年几乎没怎么发生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也就是说，当民众对示威游行活动表现出较低的参与意愿时，当地政府的动员意愿也相对较低。另一方面，西安和广州等大城市，出现了激烈的反日示威游行。通过记者在当地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地区出现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背后隐含着政府动员。

本研究发现，民众本身原本具有强烈的参与示威游行活动的意愿。基于民众自身具有的强烈自发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政府作用的时候，发现很难认同政府在民众示威游行活动中发挥着火上浇油（或者是动员）的作用，同时，政府对民众基于自身感性的行动模式也难以保持袖手旁观的态度。因此，从政府与民众的力量关系来看，可以推测当政府认为难以完全抑制示威游行活动时，会对民众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采取容忍的态度。对此，在 2012 年反日示威游行现场进行采访的记者进行了如下的分析：“并非完全是政府主导的示威游行，实际上，应当是处于一种难以完全控制的状况。（中略）此时，相较于对示威游行进行压制，通过某种程度容忍示威游行行动，进而降低因由对社会的不满所带来的压力”（福岛香织，2012：221-222）。虽然中国各地发生了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但是在那些没有出现发生示威游行迹象的地区，当地政府无意故意发动示威游行活动。此外，在那些民众参与意愿强烈且显现出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活动迹象的地区，当地政府不会强行对示威游行活动进行压制，而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容忍视示威游行活动的发生。

---

<sup>22</sup> 第35条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sup>23</sup> 上述研究结果指出，对政治的不满与人们参加示威游行活动之间并不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对此，城山英已指出：“日本国民不应当仅仅将2012年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看作是中国民众表达对社会不满，是地方劳动者实施的行为，而应当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民间的反日感情（城山英已，2013：41）。

在判断地方政府在 2012 年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中的作用时，不仅需要分析政府做了什么，同时也需要分析为什么做。对于政府做了什么，可以通过记者对示威游行现场进行的采访和媒体的相关报告有所了解，对于为什么做，则需从政府和民众在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中的力量关系进行分析。由此，一般认为在中国，群体性事件<sup>24</sup>之外的示威游行活动都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因此将示威游行活动看作是政府主导行为并不贴切，而应当看作是“政府容忍的示威游行”。所谓的“政府主导的示威游行”是指并非由市民自发组织的示威游行活动，而是经由政府以及相关附属单位动员，在国家主导下举行的示威游行活动。研究发现政府不仅没有动员民众参与示威游行活动，相反政府在示威游行活动的压制方面处于一种无力的状态，因此，将政府在可控范围内容忍的示威游行活动以及非民众自发组织的经由政府发起的示威游行活动都称为“政府主导”并不合适。无论是为煽动民众感情而发起的示威游行活动，还是为减轻不断高涨的民众情绪而采取容忍态度的示威游行活动，两者虽然都是处于政府控制之下，但是其目的却截然相反。

#### 结语

有关 2012 年中国发生的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中的中国民众的态度问题，现有的研究通过对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活动人群的观察分析，推测了群众参加示威游行活动的特征和动机。本研究不属于在街头对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人群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研究，而是在居住地通过对示威游行发生之前对一般民众的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参加示威游行活动意愿的强烈程度。

首先，研究发现，2012 年反日示威游行爆发之前，不同地区和不同收入阶层群众在参加示威游行活动的意愿方面存在差异。整体而言，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人们参加示威游行活动的意愿相对较高，此外，低收入群体参加示威游行活动的意愿较高。影响人们参加示威游行活动意愿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对日的否定性态度以及强烈的爱国态度是影响人们参加示威游行活动最大的因素。此外，对在中国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认知以及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与人们参加示威游行活动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本研究尚有点不足之处。一般推测认为，在国土面积广大的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民众对日感情不同（天儿慧，2006：61-62），不同情况可以同时出现。由此，导致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对人们参加示威游行活动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考察分析中国民众参加反日示威游行内在因素的基础上，不仅需要分析具有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阶层的动机，同时，也需要对那些没有参加反日示威游行意愿阶层不愿意参与反日示威游行活动的原因以及阻隔他们参加示威游行活动的内在因素进行分析。上述问题，需要今后的研究继续进行深入的分析。

#### 参考文献：

日语文献

---

<sup>24</sup> 所谓的“群体性时间”是指“民众在很多情况下以政府和企业的管理者作为对象发起的非法集会行为”。

天児慧（2006）、『中国・アジア・日本-大国化する「巨龍」は脅威か』筑摩書房。

川村範行（2012）、「現代中国の社会変動とメディア政策に関する分析及び考察-群体性事件とネット世論の影響力」『名古屋外国語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43号、25-48頁。

川村範行（2014）、「尖閣諸島領有権問題と日中関係の構造的変化に関する考察」『名古屋外国語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46号、27-51頁。

江暉（2013）「中国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及びその構造モデルに関する検討-2012年中国全国調査の結果に基づく考察」『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環境報学研究 調査研究編』第29号、第221-249頁。

興梠一郎（2013）、『中国 目覚めた民衆-習近平体制と日中関係のゆくえ』NHK出版。

城山英巳（2013）、「反日デモの社会構造 中国社会の『分裂』とその背景」『国際問題』第620号、第29-43頁。

陳嵩（2011）、「尖閣諸島問題に対する中国民衆意識の実態と情報源に関する一考察：遼寧省における調査を基礎として」『東京大学大学院情報学環紀要』第80号、第133-151頁。

陳嵩（2014）、「『非接触型対抗』の誕生-尖閣問題は、いつ・どのように問題化したか」（園田茂人編『日中関係史1972-2012IV民官』東京大学出版会）、第109-128頁。

玄大松（2006）、『領土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誕生-「独島/竹島問題」の政治学』ミネルヴァ書房。

福島香織（2012）、『中国「反日デモ」の深層』扶桑社。

森功（2012）、「最大の反日デモに潜入した」『文芸春秋』第90（14）号、第136-145頁。

S. P. ハンティントン（1972）、『変革期社会の政治秩序』（内山秀夫、原著是1968年出版）サイマル出版会。

#### 中文文献

中国国家统计局編：《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